

# 全球对话

14.3

##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三期，以多种语言刊出

### 与 Geoffrey Pleyers 谈社会学

Breno Bringel

### 日本社会学会 成立 100 周年

Yoshimichi Sato  
Chikako Mori  
Masako Ishii-Kuntz  
Naoki Sudo

### 迈向 新国际主义的 政治宣言

ADELANTE – Dialogue of Global  
Processes  
Progressive International  
Ecosocial and Intercultural  
Pact of the South  
Nigeria Socio-Ecological  
Alternatives Convergence  
ReCommons Europe

### 理论观点

Lidia Becker  
Christine Hatzky

### 开放行动

John Feffer  
Hamza Hamouchène  
Marta Romero-Delgado  
Andy Eric Castillo Patton  
Gomer Betancor Nuez

### 议题开讲

> 重建依附理论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4卷 / 第3期 / 2024.12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



# > 编辑的话

**本**期刊物由一场对 Geoffrey Pleyers 的专访打头阵。他是ISA的现任会长，当选于墨尔本的第二十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在这次的社会学对话中，Pleyers 和我们谈到了他对社会运动研究的贡献、对全球社会学的看法，以及他如何理解当代世界与社会学在这之中扮演的角色。

本期的第一个专题，以日本社会学会成立 100 周年为主轴。其中，会长 Yoshimichi Sato 和董事会的几位成员，分别追溯了日本社会学学会制度化的不同阶段；日本与全球之间的连结、日本社会学的最新趋势、国际化等主题，都是本专题中特别重要的主题。

第二个主题，则是当代的政治宣言。宣言是一种集体工具，经常用于为特定思想或计划公开地进行定位。一份宣言经常涵括了对历史与关键时刻的诊断、对社会政治现实的诠释，以及对替代方案的寻求——我们可以说，宣言也是某种度量当下的探测器。如今，文明陷于深沈的病症、替代方案面临危机；有鑑于此，本专题汇集了五份国际主义政治宣言，它们各自针对社会与政治变革，提供了一些建议与视野。其中，有全球性的宣言，也有地域性的，比如以非洲、拉丁美洲或欧洲为主要对象；这些宣言皆针对群众动员程序的重构，提出了可能的路径，并讨论了相关的短期、中期议程。

由 Lidia Becker 与 Christine Hatzky 撰写的理论专题，则以深具挑衅意味的命题出发：近数十年来，社会理论的不同分支（例如后殖民研究与性别研究），花了不少时间关注差异，却未曾着眼于相似性（similarity）。在文章中，作者尝试提出了一个考量互连性（interconnectivity）、聚合性（convergences）、类比性（analogies）与同时性（simultaneities）的研究议程，期望能发展出以关系性为基础的相似性的理论概

念。这样的尝试，也呼应了近日关于多元性与新本体论的论辩。

开放运动专题，探讨了两个受到许多关注的议题：一是近期针对两个独裁政府（孟加拉与委内瑞拉）的抗议，以及这些活动的后续影响；二是巴勒斯坦持续的种族灭绝，与全球气候正义之间的关系。此外，本专题中的文章，也梳理了西班牙过去二十年间的社会运动转型。最后的议题开讲，则强调了细致地重构依赖理论、回顾其根源并重新检视相关著作的重要性。

希望您喜欢今年的三期杂志。2025 年，《全球对话》将迎来创刊的十五周年。我们将能够借着这个独一无二的时机，评估公共社会学与全球社会学的现况，并连结世界不同地区的倡议。■

Breno Bringel，《全球对话》编辑

> 《全球对话》以多种语言发布于[官方网站](#)。

> 投稿请寄信至[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mailto: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 编辑团队

主编：Breno Bringel.

助理编辑：Vitória Gonzalez, Carolina Vestena.

副编辑：Christopher Evans.

执行编辑：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顾问：Michael Burawoy,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 区域编辑团队

阿拉伯世界：(黎巴嫩) Sari Hanafi, (突尼西亚) Fatima Radhouani, Safouane Trabelsi.

阿根廷：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Dante Marchisio.

孟加拉：Habibul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Bijoy Krishna Banik, Shaikh Mohammad Kais, Abdur Rashid, Mohammed Jahirul Islam, Rasel Hussain, Md. Shahidul Islam, Helal Uddin, Masudur Rahman, Yasmin Sultana, Ruma Parvin, Rashed Hossain, Ekramul Kabir Rana, Farheen Akter Bhuiyan, Khadiza Khatun, Arifur Rahaman, Md. Shahin Aktar, Suraiya Akhter, Alamgir Kabir, Taslima Nasrin.

巴西：Fabrício Maciel, Andreza Galli,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Ricardo Nóbrega.

法国/西班牙：Lola Busuttil.

印度：Rashmi Jain, Manish Yadav.

伊朗：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Elham Shushtarizade, Ali Ragheb.

波兰：Aleksandra Biernacka, Anna Turner, Joanna Bednarek, Sebastian Sosnowski.

罗马尼亚：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Bianca-Elena Mihăilă.

俄罗斯：Elena Zdravomyslova, Daria Kholodova.

台湾：李宛儒, 周芸瑄, 郭智豪, 简芊楹, 黄翊硕, 赖奕玮, 林韵柔, 吕道咏, 李妮

土耳其：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在「社会学对话」的部分，Breno Bringel 与 Geoffrey Pleyers 讨论了全球社会学、当代世界和社会学所扮演的角色。



在主题专栏「日本社会学会成立100周年」中，庆祝日本社会学制度化一百周年。（来源：Guillermo Gavilla, 在Pixabay。）



在主题专栏「迈向新国际主义的政治宣言」中汇集了五份宣言，旨在为社会和政治变革提供建议和视野。

封面来源：Pixabay.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赞助

## > 目录

编辑的话 2

### > 社会学对话

多重危机下的全球社会学：

专访 ISA 会长 Geoffrey Pleyers

Breno Bringel, 巴西 / 西班牙 5

### > 日本社会学会成立 100 周年

日本社会学与日本社会学学会：一个简史

Yoshimichi Sato, 日本 8

日本社会学及其全球连结

Chikako Mori, 日本 10

日本社会学研究所面临的全球传播挑战

Masako Ishii-Kuntz, 日本 12

日本社会学界的最新趋势

Naoki Sudo, 日本 14

### > 迈向新国际主义的政治宣言

全球危机与激进替代性方案宣言

ADELANTE – 全球对话进程 16

国际主义或灭亡

进步国际 18

波哥大宣言：地球公约

南方生态社会与跨文化公约 20

奈及利亚社会—生态替代方案宣言

奈及利亚社会—生态替代方案联盟 25

欧洲新国际主义宣言

ReCommons Europe 30

### > 理论观点

超越差异：多元世界中的相似性

Lidia Becker 与 Christine Hatzky, 德国 32

### > 开放运动

委内瑞拉与孟加拉的控诉：独裁者何时放弃？

John Feffer, 美国 35

全球气候正义与巴勒斯坦解放

Hamza Hamouchène, 阿根廷 / 荷兰 38

西班牙的社会运动：二十年来的转变

Marta Romero-Delgado、Andy Eric Castillo Patton 与

Gomer Betancor Nuez, 西班牙 40

### > 议题开讲

重建依附理论

André Magnelli、Felipe Maia 与 Paulo Henrique

Martins, 巴西 42

「资本主义始终是一个无偿系统。  
成本被系统性地外部化并转嫁到其他地方。」

Hamza Hamouchène

# > 多重危机下的全球社会学：

## 专访 ISA 会长 Geoffrey Pleyers



本文受访者为 **Geoffrey Pleyers**，目前是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的FNRS研究主任。自2006年以来，他便积极参与ISA的相关事务；他在2014年至2018年间担任ISA社会阶级与社会运动研究委员会（RC47）会长，并在2018年至2023年间担任ISA研究副会长、2023年7月更当选ISA2023-27年度会长。访谈者为 **Breno Bringel**，目前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是现任《全球对话》编辑，也是Pleyers教授的合作对象之一。

出处：国际社会学协会

**Breno Bringel (BB)：** 社会运动的相关学者，对于您在另类行动主义 (alter-activism) 以及全球运动等方面的贡献，应该已经很熟悉了。在您的学术作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是超越专业学术领域的界线，以重新思考社会运动与一般社会学之间的连结。能请您以自己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和我们的读者分享这个观点吗？

**Geoffrey Pleyers (GP)：** 社会运动是研究社会和社会变迁的迷人课题。社会运动既是社会的产品，也是社会的生产者。其反映了价值观和共同生活方式的变化，比如人们如何在其中使用新的通讯工具，或是个体化的过程如何作为运动的一部分。社会运动涵盖了改变社会的意图、针对特定社会议题的提醒，并改变我们看待社会、世界，以及共同生活的方式——不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许多社会运动具有庞大的力量，且成功地在多个国家散播其世界观和价值观。至于社会变迁，则不像社会行动者——以及许多社会学家——所希望的那样快速或线性。这是我最新著作《[Change is never linear. Social movements in polarized times](#)》（西班牙文，CLACSO，2024年8月）的主要论点。在这本书中，

我分析了智利2019年的社会抗争、疫情期间的运动与团结，以及巴西的进步与保守宗教运动。我认为，要理解当代社会运动以及其扮演的角色，就得先抛下我们过去对危机与社会变迁之间，以及社会运动的行动、政治变迁与社会变迁之间那种过于简单、线性的错误想像。无论是在运动一出现，便激情地宣布社会将由源头出现改变，还是悲观地将运动的爆发，归咎于少数人的集体幻想，都是过于粗暴的论述。社会变迁的形成路径极为复杂，其涉及了成千上万公民共享愤怒、梦想与团结的激奋，也涉及选举如何难以反映社会运动所推动的社会与文化变迁，以及人们如何在这样的过程中历经失望。

**BB：** 您不只经常讨论全球社会学的理论面向，也参与了全球社会学理论的建构与。我们知道您早期的研究是针对另类全球化运动，想要请问您，全球的这个视角，是如何出现于您的研究轨迹中的？

**GP：** 我在一个远离全球城市的村庄长大，父母没有机会读完中学，也只有一点点旅行的经验。不过，那个村庄位于比利时、荷兰和德国边境，是一个跨文化的熔炉，

>>

当地对于其他文化、语言、传统与历史抱持着开放的态度。

当我搬到巴黎，来到 Alain Touraine 创立、Michel Wieviorka 经营的这个中心时，我也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国际环境，有从各大洲来到这里的研究人员，其中许多人来自拉丁美洲。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皆致力于全球正义运动，或是说「另类全球化」(alter-globalization)。我参加了在阿雷格里港、孟买、巴马科和奈罗比举行的前七届世界社会论坛。那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8万名社运人士。自我接触到拉丁美洲和与之相关的社会运动以来，和来自那里的同事、朋友进行对话，便显得格外重要。这场社会运动的组织，是水平化、民主化的，我从这样的尝试中学到许多。我还访问了墨西哥，并从萨帕塔原住民运动中学到了很多，这些经验至今仍然在我的工作与个人生活、以及ISA的相关事务中，成为我灵感的重要来源之一。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在印度班加罗尔进行了一些研究，并在纽约大学进行了博士后研究。我目前也还持续在欧洲旅行、做研究，主要关注环保运动和2011年后的社会运动。

**BB：**「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的想像，似乎逐渐被「另一个世界的尽头是可能的」这样的想像所取代。一种新的反乌托邦主义——「我们别无选择」——正于世界各地出现。我们面临巨大的挑战，例如文明多元危机、民主恶化、威权主义正常化、军国主义和战争文化深化、气候、环境危机等等。您会如何评价这个情况？

GP：每一代社会学家都觉得自己正活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认为当下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决定性的危机，我们也不例外。正如拉丁美洲学者，还有您最近编辑的书所说的那样，我们将自身的时代，视为某种相互关联的危机纠缠不清的局面，即「多重危机」或「文明危机」。总之，现代性经历了一系列危机。然而，这一次，受到威胁的不仅是人类的未来，还有我们的星球。「如何在有限的地球上共同生存」，是本世纪的核心问题，而社会学必须协助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研究副会长 Allison Loconto 选择以「理解人类世正义」作为2025年拉巴特论坛的主题，我则提出「有限星球上的全球社会学」，作为2028年韩国光州世界大会的名称。

气候变迁和自然的破坏，并不是这个时代才开始变快的。这些现象，根植于人们看待世界、组织生活与社会的方式，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无与伦比的速度与程度，提高了大部分人类的生活水准。然而，现代性的成功，却对自然带来了破坏。即便气候问题日益加剧，我们破坏自然的速率却仍在加快。我们跨越了一个又一个门槛、走上了不归路，打破了自然循环的平衡、影响了未来的几个世纪。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我们仍然生活得好像情况并非如此。我们迫切地需要做出改变，却几乎没有人对此感到焦急。

事实上，在许多面向上，我们似乎还倒退走了。在两极、分化世界观的驱动下，威权主义、种族主义、战争、反动的行动者兴起，因应生态的措施更受到强烈抵制。威权主义的兴起，同时也对社会科学造成威胁。我对学术自由遭受的损害深感担忧，每一周，我们都会被

通知，都会有一些社会学家因为他们的研究、对民族主义领导人的批评而受到威胁、停职或镇压。我们需要更好地组织起来，支持我们的同事，并要求政府保护（并在许多情况下停止攻击）学术自由，停止迫害社会学家和科学家。

学术自由的威胁，也来自学术界的一些行动者。我们呼吁每所活跃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学、基金会和机构，停止歧视从事特定主题、特定族群的研究，不再压迫那些反对战争、暴力和镇压的同侪。

**BB：**这真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情景。

GP：是的，但这也只是一部分而已。与此同时，在世界的不同地区，我们也能目睹充满希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创新，比如「气候世代」运动的动员与行动、比如长时间以来慢慢觉醒的全球意识，以及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世界、与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正在逐渐改变。

在数位世界、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以及极端的贫富差距之下，我们身处于一个复杂的时代、生活于一个在各种层次上更加紧密连结的世界当中。污染、温室气体排放和自然破坏对全球的影响，也使得相互依存性不断增强。

**BB：**面对这些挑战、未来可能出现的灰暗情境，以及即将发生的多重危机，您认为社会学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GP：过去几十年世界间的变革，以及新兴的批判观点，深刻地改变了社会学。这个学科的诞生，是伴随着工业现代性的出现。当时，人们以为自然和经济成长是无限的，民族国家屹立不摇、西方白人被认为是世界的领导者——当然，他们确实可以说是引领着社会学的一批人，其思考世界的方式对于现今的许多概念和理论仍然有深远的影响。

这是否意味着社会学正陷入危机？自1970年代以来，社会学的危机便不断重演。透过阅读和会见来自不同大陆的社会学家，我有了与此完全不同的理解：我认为，我们身处于一个社会学的非凡时代。自本世纪初以来，我们的学科经历重大变革、变得焕然一新。这主要是因为，过去数十年间，社会学对于学科边陲，甚至是来自学科之外的、带有反对立场的批评，有了更加开放的态度。这为不同思想、研究、地理区域和理论的对话，开闢了更多空间，使得具有批判性，却也富有成效的对话得以发生，也形塑了关于世界和社会学的、新的思考。由于女性主义与交织取径、底层/后/非殖民研究以及南方观点、知识论的贡献，新的对话于是开启，新的声音也得以被听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重新审视了社会学的学科历史、准则以及一些主要偏见。

要做的还有很多。不过，我们应该先把视角放在二十一世纪的前二十五年，社会学界取得的成就。我还是学生的时候，社会学的历史，就是由一些西方学者的贡献来总结的。如今，要谈社会学的历史，我们得专门为 W.E.B Du Bois 开一堂课，在整合性别和交织理论之后，

才来讨论不平等；在不提及全球南方重要贡献的情况下讲述当代理论，也是不行的。承认其他研究人员的贡献和观点，为重新审视我们的学科、提出不同的问题，打开了一扇大门。最重要的是，这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审视其挑战，并能创造更公平、更永续的替代方案。正如我在上一期《全球对话》(13.3)中提到的，这进一步肯认了过去、现在的西方社会学家，所做出的那些重要贡献：「全球社会学不该继续以西方大学与经典的普遍性宣称为前提，也不该只着重于批判此点。」

**BB：我们现在有哪些关键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办得到吗？**

GP：我认为，这包括威权主义、反动行动者的崛起，以及气候变迁和生态崩溃。这些问题促使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世界（和社会学），并有效地为应对挑战做出实质的贡献。这项任务很艰巨，但我们也有新的资源来完成它。

数位世界和人工智能的兴起，不仅带来了新的挑战，也让我们有了更强的分析工具，能够存取更大量的资讯。更为重要的资源，是我们将能够更好地整合世界各地研究人员知识、分析与贡献。在许多方面，社会学比本世纪初更加开放、富有创造力和扎实。我们有更完善的能力，可以了解世界做出贡献，并应对当今的挑战。二十世纪上半叶对社会学家来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期。

**BB：《全球对话》能如何协助我们克服这些障碍？**

GP：透过《全球对话》这个媒介，我们能在简短、易读的文章中，借由深入分析地方现实，厘清各大洲的复杂议题，而且这些内容，是研究人员、学生与公民都能够理解的。这正是自 Michael Burawoy 创办这份刊物以来，所提倡的全球与公共社会学的内涵之一。

每一期的《全球对话》，都显示「全球」并非是一个与地方现实的毫无关联的层级（这将是「方法论的全球主义」）。相反地，全球社会学是建立于世界各地社会学家的贡献之上。■

# > 日本社会学与日本社会学学会： 一个简史

Yoshimichi Sato，日本京都先端科学大学，日本社会学学会会长



第97回 日本社会学学会大会  
2024年11月9~10日  
於 京都産業大学

 The Japan Sociological Society

| 出处：日本社会学学会

**我** 将仅从我的角度对日本社会学及日本社会学学会（Japan Sociological Society，简称JSS，下同）的历史进行简要的描述，这是因为要涵括这段超过一百年的历史的所有细节毕竟已经超过了我的能力范围。

## > 旨在于改善日本社会的创办

JSS 创立于 1924 年，但在这之前日本社会学家便已经开始了社会学的研究。正如孔德（Auguste Comte）在法国革命以后构想法国社会的重建那样，日本社会学家也在明治维新以后对日本社会能够以及应该如何被建构进行设想。他们严重依赖了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思想，但正如Akimoto所说的那样，他们是根据各自的政治立场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去加以诠释的。

日本社会学致力于反映日本社会的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ies）并寻求解决。日本社会战前的主要社会问题是劳动问题、贫穷以及民族主义，日本社会学家仔细地研究了这些问题，希望能够改善日本社会。尽管战前的日本社会学严重地受到欧洲社会学的影响，Yasuma Takada，一位日本社会学历史中的一位巨人，还是建

立了一种以社会连带作为社会学基础的原创理论。他的意图是使社会学成为社会科学种的一个独立领域。其理论的原创性受到了当代日本社会学家的高度重视，而他的作品也成为了战前日本社会学的一个里程碑。

## > 后二战时期：现代化及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社会学家继承了 Yasuma Takada、Teizo Toda、Eitaro Suzuki 等伟大的战前社会学家的理论遗产。与此同时，根据 Tominaga 的《战后日本社会学》（Sociology of Postwar Japan），他们还针对诸如家庭社会学、乡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和工业社会学等特定领域都进行了社会学的考察。这导致了日本社会学的碎片化。而面对这一境况，出现了两大理论流派：现代化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现代化理论受的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及其同僚所提出的结构功能论的影响，它主要专注在现代化和工业化对社会各阶层所造成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也针对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影响进行研究，但其分析视角与现代化理论有所不同：它主要专注于阶级结构的影响。而这是源自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理论。

>>



现代化理论是在日本经历经济高度增长的时期（1955-1973）变得流行的，描绘了日本社会当时的现实情况并且乐观地预测了它辉煌的未来。然而，这一理论因为几个原因而丧失了声望：它无法解释日本在经济泡沫破裂以后社会与经济停滞状况；并非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跟随它预测的轨迹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吸引了许多日本社会学家。他们观察社会种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社会问题，例如资本家／雇主与工人／雇员之间的冲突，以及在污染问题上大企业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冲突。然而，这一理论同样因为不同的原因而被削弱，比如新左派的崛起和苏联和东方集团（Eastern Bloc）的解体。

### > 新方向、美国影响，以及 SSM 调查

在现代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衰弱以后，所谓的多重典范（multi-paradigm）时期开始了。这一时期出现了各个领域的出色理论：例如现象学社会学（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以及关注资讯社会、全球化以及福利国家的社会学等。

需要强调的是，战后日本社会学受到了美国社会学的强烈影响。虽然欧洲社会学也具有影响力，美式的经验研究——质性的与量化的——吸引了许多日本社会学家。其中一项主要的量化研究是「全国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即俗称的 SSM 调查。第一次 SSM 调查由 JSS 在 1955 年与 ISA 国际项目合作（ISA international project）进行。从此以后，该调查每十年都会进行一次，而下一次将会在 2025 年进行。所有 SSM 调查的数据集都可从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底下的社会科学日本数据档案馆（Social Science Japan Data Archive）获取。

### > 国内与国际之发展轨迹

JSS 是随着日本社会学的这一演变而同步发展的。自它在 1924 年建立起就开始发行其官方期刊。此期刊换了好几次名字；目前的名字是《日本社会学评鑑》（Japanese Sociological Review），第一期发行于 1950。《日本社会学评鑑》的所有文章都能从[网络上](#)取得。除了发行期刊，协会自 1925 年起开始举办年度会议。第 97 届年度会议会于 2024 年十一月在京都产业大学举行，庆祝它的百周年。会议期间会由一场特别的国际座谈会，ISA 主席 Geoffrey Pleyers 将作为特邀演讲者。

值得一提的是，JSS 一直活跃于国际舞台。正如稍前提到过的，第一次的 SSM 调查是与 ISA 项目于 1955 年合作进行的。JSS 于 1992 年出版了官方英文期刊的首期《日本社会学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ology）并在之后的每一年持续出版（此期刊在 2022 年更名为《日本社会学期刊》[Jap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许多日本社会学家与国际社会学家合作并活跃于 ISA；反映 JSS 国际活动的最重要事件是 2014 年在横滨举行的第十八届 ISA 世界社会学大会（XVIII ISA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多亏了 ISA 以及世界各国协会的支持，该大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自那次大会依以来的十年间，JSS 在同 ISA 和各国协会的协同合作下进入了国际活动的新阶段。■

来信寄至：  
Yoshimichi Sato <[sato.yoshimichi@kuas.ac.jp](mailto:sato.yoshimichi@kuas.ac.jp)>

# > 日本社会学 及其全球连结

Chikako Mori, 日本同志社大学



出处：日本社会学会

日本社会学对全球社会学讨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使得要在—篇简短的文章中对它们进行全面评估变得具有挑战性。这些贡献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不同的层面、时间和地点——举例而言，[Chizuko Ueno在中国的作品](#)是极具影响力的——而如何评价它们目前还尚欠明确共识。事实上，评价会因评估者的观点而大不相同。因此，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对所有贡献进行评估，而是要强调日本社会学学会（Japan Sociological Society, 简称 JSS, 下同）及其成员为全球社会学讨论建立连结和提出贡献所做的努力，从而促进了 Geoffrey Pleyers 所说的「更新的全球对话」。

## > 从「西方中心主义」到「国际化」的尝试

日本社会学的发展，正如[Shigeto Sonoda](#)所指出，其历史可以往回追溯到1880年代，从一开始就带着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当时候大多数的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接受、引介以及消化。而在1924年建立的JSS中，出现了一些声音要求与全球社会学有更多的连结。如[Seiyama](#)所指出，JSS是最早的八个国家社

会学协会之一，并于1950年在国际社会学协会（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简称ISA, 下同）发出倡议时加入该协会，当时ISA成立仅一年。作为JSS的代表，Kunio Odaka参加了ISA首届大会，而他在大会中呈现的全国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简称SSM）之成果随后于1959年被Lipset和Bendix所引用。

JSS的一些成员持续地参与到ISA当中，包括加入了执行委员会（2010-14）的Yoshimichi Sato。[Hasegawa](#)向我们指出这些努力最终促成了2014年在横滨成功举办的第十八届国际社会学协会大会（XVIII ISA Congress），此次大会吸引了超过六千名参与者。需要留意的是，由JSS主要成员所追求的国际化的道路与日本政府以提升国际排名为目的的民族国家模式（nation-state model）的国际化进路是截然不同的。正如Shujiro Yazawa于2011在《全球对话》中受[Michael Burawoy](#)访问时指出的，社会学真正的国际化在于在全球或地球社会（planetary society）中建立一种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全球社会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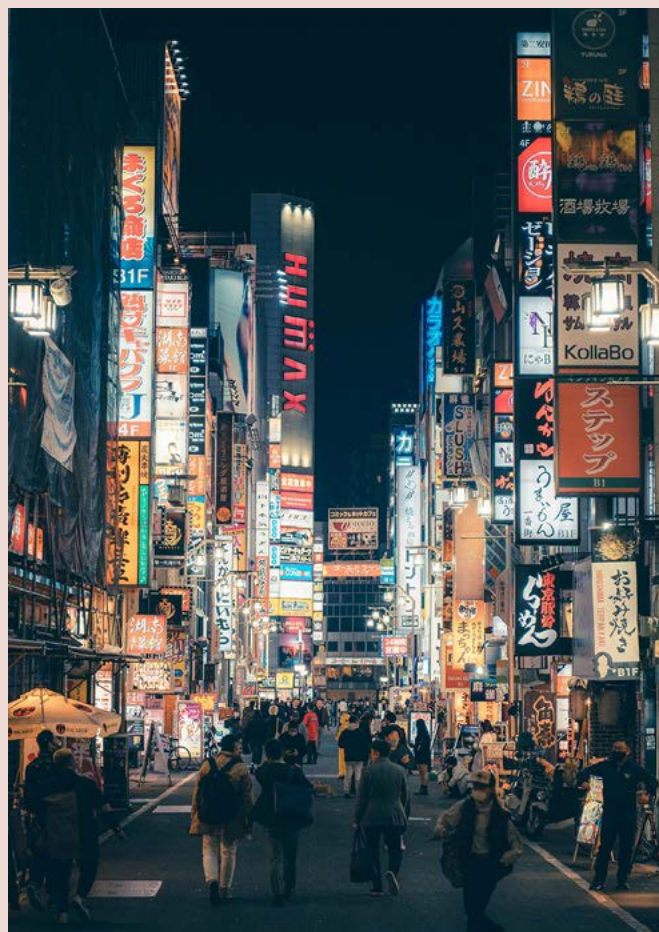
## &gt; 专注于东亚社会学

除此之外在区域性层面也有着显著的努力。如Sonoda 所指出，自 1980 年代以来，包括中日社会学协会 (Sino-Japanese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在内的多个协会相继成立，同时日本社会学家也日益参与更广泛的亚洲社会学网路，比如 1996 年成立的亚太社会学协会 (Asia Pacific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和 2010 年成立的亚洲社会研究协会 (Asian Social Research Association)。此外，在国内大学的社会学部门里头进行的国际研究项目在强化与其他亚洲社会学家的协作上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值得留意例子包括 Emiko Ochiai 和 Yoshimichi Sato 分别在京都大学以及东北大学领导的研究项目。

诸如此类的举措的制度化也正逐渐成形中。2003 年开始的东亚社会学家会议 (East Asia Sociologist Conference) 促成了东亚社会学协会于 2017 年十月的成立——其首次会议于 2019 年三月在东京中央大学举行。这些东亚的社会学交流促成了大量的出版，如 2014 年出版的《东亚社会学的寻求》(A Quest for East Asian Sociologies) 以及 2023 年出版的《后西方社会学便览：从东亚到欧洲》(Handbook of Post-Western Sociology: From East Asia to Europe)。这些举措旨在对呼应「[一个非霸权的世界社会学](#)」(a non-hegemonic world sociology) 的全球社会学作出贡献。

## &gt; JSS 的新举措与诸挑战

为了在全球范围内连结不同的讨论，JSS 已作出了多项举措：1992年创办《日本社会学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ology)；在与南韩（自2007年）、中国（自2011年）以及台湾（自2015年）的交换协议的基础上嵌合不同的小组；还有在2023年开设官方部落格，[用英语介绍日本社会学](#)。另一项值得留意的举措是旅行奖 (Travel Award；前身是旅行补助金 [Travel Grant]，于 2008 年创立)，用于奖励希望在 JSS 年会上就特定主题——2022 年的主题为「COVID-19 与社会」、2023 年的主题为「危机背景下的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 in Context of Crises) ——发表研究的全球年轻学者。



日本东京。出处：Willian Justen de Vasconcellos，在 Pexels。

而在 2024 年，借着 Geoffrey Pleyers 于十一月九号至十号参加 JSS 年会的机会，旅行奖的主题设置为「[去中心化的全球社会学](#)」(decentring global sociology)。这已吸引了创纪录数目的旅行奖参与者。尽管与东亚各国的对话已取得显著的进展，与全球南方及其认识论——如去殖民或底层视角 (subaltern perspectives) ——的交流则相对不发达。对 JSS 及其成员而言，2024 年年会是全面参与到全球对话并且为与时俱进的全球社会学提出贡献的一次重要机会。■

来信寄至：Chikako Mori <[cmori@mail.doshisha.ac.jp](mailto:cmori@mail.doshisha.ac.jp)>

# > 日本社会学研究 所面临的全球传播挑战

Masako Ishii-Kuntz, 御茶水女子大学, 日本。



出处：日本社会学会

**在**我早期于美国的职业生涯中，鲜少在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年会或是其他组织举办的会议上碰见日本的学者或研究生。不过这样的情形大概从这世纪初开始有所改变，我越来越常在美国的会议上见到来自日本的社会学者。

## > 语言隔阂的整合与突破

2014年第十八届国际社会学世界社会学会议在日本横滨举行，至此日本的社会学家不只提高了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研究成果的意愿，也开始在以英文撰写的国际期刊上出版研究论文。国际社会学协会 (ISA) 的官网提供了2010年后的会议数据，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以上的转变。2010年，有205位来自日本的参与者出席在瑞士举办的世界会议，位居该会参与国的第七名。到了2014年的横滨会议，参与人数翻倍来到了429人。在这之后，虽然日本的参与者分别在多伦多 (2018年) 及墨尔本 (2023年) 会议减少至115及277人，不过仍是两次会议中，参与人数第五多和第四多的国家。

这不仅对日本社会学家来说是个正向的改变，对其他国家的同行来说亦是如此。回想起一九八零年代中期，当时的我正在进行博士论文研究，那时几乎没有以英文撰写的日本社会学研究，因此我大多时候只能阅读以日文撰写的书籍和其他资料。虽然能够以日文阅读是件开心的事，但同时我也觉得这些研究不应该只让懂得日文的人看见，应该要引介给其他社会学者。比起过去，现在的日本社会学家不仅更加活跃于国际会议，也会将研究投稿至英文期刊，如此一来，日本学者的研究有更大的机会可以被世界看见。

尽管日本社会学研究在近几年有更多的曝光机会，现在仍有些问题阻碍着日本研究在全球散播。以下将根据我在大学执教的经验和我所观察到的问题，讨论当前的困境为何。另外，我也会提供一些解决办法上的建议，以及介绍目前日本社会学会 (Japan Sociological Society, JSS) 针对这些挑战所采取的作为。



日本东京。出处：Oscar M.，在Pexels。

## > 国际研究的三个挑战与建议

首先，也是最主要的阻碍是，许多日本学者仍旧在与国际学者使用英文沟通时感到有些隔阂。这可能是由于日本的英文教学制度不强调对话能力的培养，Ikegashira、Matsumoto和Morita也曾指出这个问题；同时，日本社会学家又大多想将英文说得跟母语人士一样。当他们发现发表时的语言要求其实不需要到母语人士的程度时，减轻了许多不安和紧张的情绪。JSS内部也创立了一个促进国际研究活动委员会（Committee for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ctivities），除了举办英文摘要写作的年度工作坊外，也提供针对如何以英文发表研究论文的讲座。许多研究生在参与了这些活动后，摘要纷纷通过了国际社会学协会世界社会学大会的发表审查。

其次是，许多日本社会学的研究生和学者太过要求在发表和写论文时达到完美。就以在会议上发表为例，我发现许多日本学者会准备讲稿并彩排多次。虽然练习是重要的，但太过依赖讲稿会使报告变得不够流畅。除此之外，许多日本的讲者也会因为提问环节无法准备讲稿而感到非常紧张。我通常会建议日本的研究生和学者们不要害怕出错，也可以现场告知提问者自己没听清楚的部分。JSS可能需要提供相关的研讨会给学生和新进学者来精进他们的发表能力。

最后，除了克服语言障碍外，提供研究者参与海外会议的交通和住宿经费也是必须的。JSS提供了旅行补助给参与国际会议的会员，而日本政府、私人组织和大学端也都提供各式奖学金给参与海外会议的学生们，有些美国的学术单位亦提供旅费补助给国际参与者。我强烈建议像JSS这样的日本学术组织可以汇整有关参与国际会议的奖助金资讯供众人使用。

总而言之，若想将日本研究生和学术成果推广到国际，学术机构和心理层面的支持都是必要的。并且，无论是增加日本学者在国际会议上的参与度，还是在英文期刊上的能见度，也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来信寄至：  
Masako Ishii-Kuntz <[ishii.kuntz.masako@ocha.ac.jp](mailto:ishii.kuntz.masako@ocha.ac.jp)>

# > 日本社会学界的最新趋势

Naoki Sud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日本



出处：日本社会学会

日本社会学领域近期研究趋势的两个特点：首先，日本社会学家的主要研究兴趣转移至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社会学者对于方法论的兴趣不仅限于量化，还包括质性的研究方法。其次，与二十世纪相比，二十一世纪初日本社会学家的兴趣更加多样化。因此，日本社会学家的主要兴趣转向的趋势，可以解释为其只是在社会学传统领域内，增加了的新研究主题。因此，可以说日本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理论的兴趣在过去数十年间有所减弱。

## > 从社会学理论到社会学研究方法

为了证实日本社会学从理论到方法的研究重心转变，我们可以参考两位日本社会学家所写的两篇研究。第一篇是 Ken' ichi Tominaga 的著作《战后日本的社会学：一个当代史研究》（2004）；另一篇则是 Hiroki Takikawa 的文章《战后日本社会学的主题动态理论：源自结构主题模型的日本社会学主题分析评论全集》（2019）。尽管上述两作者的著作并未分析日本社会学的最新趋势，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所提出的框架能继续被应用于最新的情境。

这些作者认为，两个对立的社会学流派思潮（结构功能论和马克思主义）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主宰了日本社会学家的研究。然而，这两种研究思想都受到下一代日本社会学家的彻底批判，随后并失去了其影响力。而新的社会学理论（例如 Michel Foucault 的相关研究、Pierre Bourdieu 的文化资本理论、Niklas Luhmann 的社会系统理论、Jürgen Habermas 的传播理论、Anthony Giddens 的结构理论等等）取代了结构功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成为学者在日本社会学领域的研究理论偏好。此外，日本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理论的兴趣，自世纪初以来也迅速减弱。

根据 Takikawa 的看法，日本社会学家将社会学研究方法视为以量化为主体来分析资料的研究方法，而非将社会学理论本身视为一种分析工具；许多社会学者都热衷于使用先进的量化研究方法分析社会现象。而与此同时，其他日本社会学家则也有透过使用质性研究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例如叙事分析。正如 Takikawa 所指出的，量化与质性的研究方法在本世纪前二十年是被日本社会学家广泛接受的。上述事实也显示了在二十一世纪初，日本社会学界的量化与质性方法并非竞争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

>>

一般来说，先进量化研究方法的扩展，可视为此学科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正常化迹象。只是上述的量化研究方法，在二十一世纪初期是与质性方法有着正面的共存关系的，只是质性本就比量化更难以透过科学方法来标准化规范。而这也显示了日本社会学者对量化方法的偏好，并未反映出他们对此领域作为一门科学学科在规范上标准化的偏好。因此，我们应该探讨其他日本学者从理论转移到其他社会学方法的原因。

### > 二十一世纪日本社会学多元化的主题

Hiroki Takikawa指出，二十一世纪日本社会学者的研究主题比二十世纪后期更为多样化。具体而言，日本社会学者除了传统研究主题（社会阶级、家庭、劳动、组织、都市研究等）之外，增加了新的研究主题（如环境问题、性/性别、自我认同等）。我们假设他们都使用了新的量化和质性研究方法来处理这些复杂且高度相互关联的主题。此外，对于这些社会学学者而言，这些方法也可望成为他们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和社会资料科学等）的学者之间的重要沟通工具。研究主题的多样化，以及与不同学科的社会科学家合作的需求，很可能是日本社会学家开始强调与展现他们对研究方法兴趣的原因。

此外，日本社会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经历了快速的社会变迁。对于日本社会学家而言，这样的变化使得实际且即时的解决方案变得困难。首先，日本人口在这段时间大幅度地老化，日本已成为如今全球最高龄的国家之一。这使得永续性成为日本在谈论社会福利制度时最重要的问题。其次，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停滞。因此，非正式员工（兼职和临时工）佔整体劳动力的比例上升。此外，由于因为需要解决劳动力短缺所带来的问题，移民人口和妇女劳动参与率也不断增加。这些变化都扩大了社会的不平等，并带来了传统社会学理论无法解释的新社会问题。

因此在二十一世纪初期，日本社会学者必须处理传统社会学理论无法解释的新课题，他们的研究取径也由理论转移到研究方法。这并不是说理论对日本社会学家不再有帮助，而是他们需要新的社会学理论来充分解释新的社会课题，并专注于处理新出现的任务。如果没有建立新的理论来解释这些议题，那么日本社会学家们将无法确定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法究竟为何。

### > 结语

日本社会学的近期趋势似乎与全球社会学的趋势有部分共鸣。虽然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社会在二十一世纪初人口迅速老龄化、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情况可能很显著，但笔者认为，研究取径从理论转向方法、研究课题的多样化是全球社会学领域的共同特征。这种趋势所导致的问题不仅存于日本社会学界，同样也发生在全球的社会学领域。这样的现象显示，日本的社会学家们应该与国际的社会学者合作，共同克服他们在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问题。■

来信寄至：Naoki Sudo <[naoki.sudo@r.hit-u.ac.jp](mailto:naoki.sudo@r.hit-u.ac.jp)>

# > 全球危机与 激进替代性方案宣言

ADELANTE - 全球对话进程

| 出处：[Adelante](#)，2024。



## > 我们面临的危机

• 世界正卷入多重危机的深渊。深层的裂痕将人类分裂，也将人类与大自然的其他部分分割开来。目前佔宰制地位的压迫性系统存在根本性的缺陷，造成并维持这些危机。这个系统的根源在于阶级、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父权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统治、种性主义的结构与关系，以及我们人类中心的视角。正是这些根源，而不仅是从危机中表现出来的症状，也同样需要被挑战和改变。

• 极权、帝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政权的文化霸权对人民和大自然的主宰是一个历史进程。这使得整个社会变得可有可无，并取代和摧毁了不同的认知/存在/行为/生活方式。

• 在现今军工复合体和资本主义的支持下，宰制体系制造或助长民族国家、种族和宗教信仰之间的战争和冲突，无辜的人民和环境面临最严重的后果。

• 生态危机，包括生物多样性的流失、气候变迁、地球的污染和毒化，已将地球带到第六次大灭绝的边缘：这是人类行为造成的第一次大灭绝，进而损害数十亿人的生命和生计。

• 以无止境的经济成长为基础的「发展」取向本身就是不永续的，它制造了「已开发国家」、「新兴国家」和「未开发国家」等错误的区分，并鼓励不健康且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

>>



•制造多重危机的体系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大堆「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只治标不治本，例如碳交易、绿色成长、净零排放、地球工程及其他技术修复与市场取向。

•这些危机的不同面相相互交织。因此，我们需要整体性、跨部门和整合性的对策，并指出真正、系统性的替代性方案。

## > 人们的反应：抵抗与替代方案

•为了因应这些危机，大量的草根行动和社会运动正在崛起。这些运动阐述并展现了转型过程，引导我们迈向一个多元、民主、去殖民、公正、公平/平等、解放、女性主义、生态智慧、和平、后资本/后发展主义、生物文化、繁荣、共同实践和以基进的爱为基础的世界。每个运动对于这些价值与词汇都可能有自己的诠释与理解，即使我们根据共同持有的基本价值与道德信念将自身编织在一起，我们也应该尊重这些多元性与多样性。

•原住民、草根社区、等各种集体与个人都在实践永续、公平的生活方式，包括生态农业、夺回公有地、社区健康、替代性学习与教育、性别与性正义、基进民主与能动性、以关怀和分享关系为优先的在地化经济、工人拥有或控制的生产、维持或恢复与所有大自然的二元关系，以及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社群对大自然的保护、维持或恢复文化、语言、知识系统与存在方式的多样性，以及其他类似的选择。其中许多都包含在尊重生命的世界观中，有些是祖先与原住民传统的延续，有些则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反趋势。然而，这些倡议还太小或太零散，无法获得更广泛变革所需的临界质量。

## > 我们对转型的承诺

为了迈向深度转型，我们承诺：

- 分享和了解重要的改变策略，并推广已实现的鼓舞人心的改变故事。
- 贡献于共同奋斗，争取裁军与和平，以创造公正的社会与生态转型。
- 探索并深化我们共同的立场、伦理与价值，即使我们同样讚许并尊重多样性与差异。
- 负起政治决策的责任，最重要的是由下而上建立人民的力量。我们的行动是要确认，这不是宰制的力量（power over），而是正向转变的力量（power to/with）。
- 将反抗运动和建设性的替代性方案连结起来，创造我们想要的世界。
- 推动从地方到全球的草根直接行动，超越民族国家，建立各地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凝聚与关怀。
- 将我们的尊重与关怀延伸至更广泛的生命圈。
- 推广在民主控制下的对民众平等的再生科技和友善工具。
- 建立一本共通（但多元、文化多样）的字典，并了解各种语言的词汇。
- 探索宰制系统在多大程度上根植于我们自己习惯的组织与关系方式中，并致力于个人与集体的疗愈工作，以支持我们迈向更深层连结的存在方式。

尽管有强大的人民运动在辨识与抵抗这些危机背后的力量，同时实践与推广公平且永续的基进替代性方案，但我们仍缺乏前后一致、整合的回应。因此，我们承诺在沟通、建立关系与合作上，让我们的社群、组织与运动能够集中力量，共同合作。我们秉持民主、没有阶级化的动员精神，对各种意识形态、策略、路线和观点持开放态度，以寻求进步转型，迈向我们想要且需要的世界。■

自2020年11月以来，[全球替代性方案织锦 \(GTA\)](https://adelante.global/) 开始在寻求系统性的、由下而上的转变以实现正义的各种全球进程之间展开对话。除了GTA之外，还包括：[全球对话进程](#)、[全球绿色新政](#)、[超越发展全球工作小组](#)、[草根到全球](#)、[多方汇流](#)、[进步国际](#)和[迈向新世界社会论坛](#)。这个平台在2021年被命名为ADELANTE，并拥有自己的网站，提供最新资讯和资源：<https://adelante.global/>。

# > 国际主义或灭亡

进步国际



出处：[进步国际](#)，2024。

**在** 2020年9月举行的进步国际首届高峰会上，理事会通过了以下宣言。

## I. 国际主义或灭绝

本世纪的危机威胁着各洲各国所有生命的灭亡。国际主义不是奢侈品。它是生存的策略。

## II. 进步的定义

我们的使命是建立一个进步力量的地球阵线。我们将「进步」定义为对以下世界的渴望：民主、去殖民化、公正、平等、解放、女性主义、生态、和平、后资本主义、繁荣、多元，以及被基进的爱所约束。

## III. 世界各国人民，组织起来

我们是工人、农民、和全世界人民起身反抗专制寡头的反动势力。我们的目标是国际组织：结合跨国界的力量，以夺回属于我们的地球。

## IV. 我们建立基础设施

我们的任务是为国际主义建立基础设施。进步的力量仍然支离破碎，而财富和权力却在世界各地巩固。我们为地球阵线建立鹰架，让它有力量战斗并取得胜利。

## V. 团结，而非墨守成规

我们透过共同奋斗来寻求团结。目前的危机需要所有进步力量的策略联盟。但协商不需要屈服。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盟，同时为联盟内部的创造性论点留出空间。

## VI. 透过相互力量建立夥伴关系

我们相信，没有相互力量的夥伴关系只是宰制的另一个名称。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的目标是重新平衡，而不是在我们的联盟中重现权力的差距。

## VII. 资本主义是病毒

我们渴望根除各地的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剥削、剥夺和环境破坏已经写入资本主义的基因密码。我们不支持拯救这个体系的努力，也不支持让它扩张到地球的每个角落。

## VIII. 国际主义意味着反帝国主义

我们的国际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从战争和制裁到私有化和「结构调整」。我们相信这些不仅是某些国家支配其他国家的工具。它们也是分化的工具，让世界各国人民互相对立。

## IX. 语言就是力量

我们使用多种语言。语言障碍强化了阶级统治、白人至上和原住民被剥夺的权利。我们的目标是超越语言障碍，找到我们共同的反抗语言。

## X. 前线的自由

我们的国际主义是交织的：我们相信种族资本主义在其帝国扩张过程中所积累的层层压迫，需要我们将争取解放的前线抗争集中在全球经济的基层：为了食物、为了土地、为了尊严、为了解放。

## XI. 国际解放主义

我们反对种族主义、种性主义和所有形式的社会宰制。我们承认白人至上是世界体系的组织原则。我们反对压迫性阶级制度，这是我们国际主义的基础。

## XII. 去殖民不是隐喻

我们的目标是使地球去殖民化。我们不满足于象征性的去殖民行为。我们的要求是对过去的罪行作出全面赔偿，并立即恢复世界上所有被剥夺人民的土地、资源和主权。

## XIII. 女性主义政治、女性主义实践

我们相信，在性别压迫的体系中，没有人是自由的。我们的目标是打破父权体制，同时破坏它所依赖的二元性别结构。我们的政治方向是关怀、合作和共同负责。

## XIV. 布宜诺斯艾利斯

我们不以成长来衡量进步。扩张的急迫性是生态灭绝的引擎。我们追求免于饥饿和匮乏的美好生活方式，并以集体共存的品质来界定我们的成功。

## XV. 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

我们的目标是持久的和平。但和平只有在社会正义的保障下才能持久。我们努力拆除战争机器，代之以以合作和共存为基础的人民外交。

## XVI. 革命，而非政权更迭

我们支持人民运动来改变社会和收复国家。但我们反对为了保护资本利益和协助帝国进步而推翻政权的企图。

## XVII. 赢得选举是不够的

我们的任务是在地球上建立人民力量。选举是改变政治、将人民需求转化为政府政策的机会。但我们知道，赢得选举不足以完成我们的使命。

## XVIII. 来自多元化的力量

我们的联盟受共同的集体解放愿景所约束。我们不强加这个愿景，也不将一个方案强加于其他方案之上。相反，我们将我们的需求、知识和政策优先顺序联系在一起，以建立一个共同的计划，从多元主义中获得力量。

## XIX. 关系是基础

我们的国际主义是亲密的。新技术承诺了社区和连接，但却播下了嫌隙与幻灭的种子。我们相信，除非我们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了解和信任，否则我们无法成功。

## XX. 对话是不够的

我们的目标是集体行动。我们不满足于建立一个社会网路。我们的活动为全球动员做好准备，使我们采取的行动规模与我们的危机规模相匹配。

## XXI. 不以盈利为目的

我们的活动资金完全来自捐款和会员捐献。我们不接受营利机构和石化燃料公司、药物公司、大型科技公司、大型银行、私募股权投资、对冲基金、农业综合企业和军火工业代表的资金。

## XXII. 我们不是非政府组织

我们的目标是团结，而非慈善。我们相信真正的改变来自人民的运动，而非慈善机构的仁慈。我们只对这些运动和从中成长的社区负责。

## XXIII. 全方位抗争

我们的联盟反映了世界抗争的多样性。我们欢迎工会、政党、运动、出版社、研究中心、邻里协会，以及个别行动者的孤独抗争。这个联盟的力量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足以重塑世界。

## XXIV. 从每个人，到每个人

我们的会员模式很简单：各尽其能，各取所需。我们期望会员以他们力所能及的方式参与我们共同阵线的建设。我们努力以会员抗争所需的各种方式支持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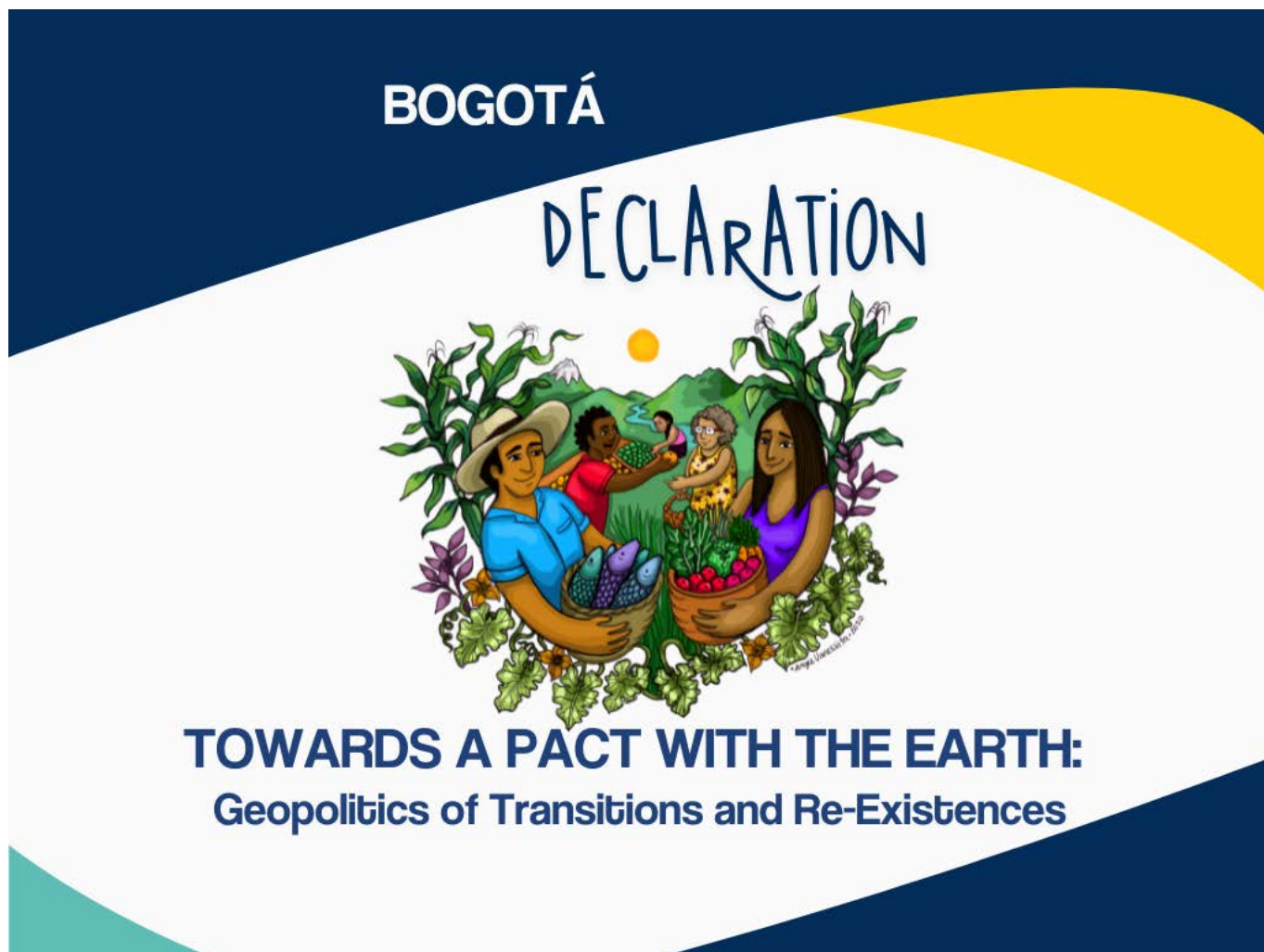
## XXV. 团结不是口号

我们相信团结是一种行动。对我们的盟友表示同情是常见的。我们的任务是承认他们的抗争是我们自己的抗争，组织我们的社区参与这场抗争，并跨越国界携手合作，共同捍卫人类和地球。■

本宣言是在 2020 年 9 月举行的国际进步协会成立高峰会后通过的。有关该运动及其倡议的更多资讯，请浏览 <https://progressive.international>。

# > 波哥大宣言：地球公约

南方生态社会与跨文化公约



20

| 出处：南方生态社会和跨文化公约，2023。

COVID-19 疫情爆发后，「新的正常生活」对多数人来说象征着混乱与不稳定。这种新的全球现状反映出几种相互关联危机（社会、经济、政治、生态、健康和地缘政治）的不断恶化，而这些危机在我们讨论社会文明层面上也是互相巩固的。然而我们注意到，全球制度与民主的实践正在减弱，同时极右和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在增强，各层面的文化战争也在延续，这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父权体制和种族主义的加剧有着深厚的关联性。

## > 反对新的文化战争

在当前的历史时刻，我们必须区分战争的不同层次。

首先是关于生命和自然的战争。多处地区的军事化，以及日益增加的暴力正猛烈地摧毁着领土，而且这些暴力在妇女和大自然捍卫者的身上更是明显可见。尤其是身为原住民的她们，或是在种族/民族被边缘化的族群，特别是非裔族群更有可能遭受上述的暴力。而就全球与地缘政治

>>

而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实，同时也使能源、人道主义与粮食危机的情况恶化。此外，在帝国间相互对抗的背景下，核武的威胁也再度浮现。

同样地，父权制度、种族主义、仇视跨性别和仇外的极右意识形态在全球发展扩张，加上政治体制逐渐被经济问题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左右，使得资本主义拥有了比人权和生命更重要的优先地位。上述情况，特别是在金融、碳氢化合物、农业综合企业、军火、汽车、企业媒体和制药等行业。这些状况反映了被资本所控制的生产部门，他们也对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所产生战争和对人权与生命权的忽视负有最大的责任。因此，为了公正的生态社会转型而努力，必然会涉及到捍卫民主的所有层面，从制度、国际、国家和地区政治领域，到自我管理、领土和地方自治形式的建构都非常地重要。

其次，战争正促使与企业「绿色转型」相关的传统和新形式的开发主义进一步恶化。现在，全球北方朝向所谓「清洁」的能源转型，但这样的转型事实上是透过对全球南方的压榨而来的。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的土地大力开采用于生产高科技电池的钴和锂，以及其他转型所需之策略性矿产。此外，这种对全球南方的施压开发也显现在风力涡轮叶片所需的轻木需求，或是大规模太阳能发电场，以及氢燃料大型计画新基础设施所需的土地面积竞争。

近年来，不同的「绿色经济」提案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它们是多样化且具高度异质性的。然而，总体来说，它们已成为全球北方政治论述的框架，是为了减少碳排放并促进所谓「公平」与「永续」的经济成长。气候正义通常是这些绿色合约的核心宗旨，为从过去到现今人们对环境所造成负面影响的社区，提供分配补偿的资金。但是，气候正义往往局限于国内的愿景。全球北方急于转向再生能源，却很少考虑到它们对全球南方的多重影响。

这是 Breno Bringel 和 Maristella Svampa 所谓的「去碳化共识」的出现：一个虽然主张改变能源来源（从化石燃料转为「可再生」能源），但却加深现存不平等并继续将大自然商品化的过程。这个共识的目标是在不改变地球社会的新陈代谢模式（生产、消费、商品流通和废弃物的产生）的情况下来实现去碳化，却在无限期经济增长之意识形态下，反倒加强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

有鉴于此，我们重申近期发表在《南南生态社会能源转型宣言》中提出的要求。我们也重申拉丁美洲和全世界迫切需改变方向，这也同时是基于人民抗争的声音和最近在本区域不同纬度所爆发的事件而要求改变的。具支配性的行动者们所提出的表面改变是远不够的。目前，即使是大型企业开始谈论「正义过渡」了，并将「去碳化共识」本身视为目的，掩盖了其重现相同累积、剥削和剥削逻辑的事实。我们必须揭开「绿色资本主义」新发展的面目，并以强烈反对，致力于彻底的能源转型，同时承认与其他生命结构平衡互惠的存在模式，并为迎向更好的未来铺路。

这项宣言想告诉人们，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减少碳排放，但同时也要质疑目前资本的之于社会的新陈代谢。霸权的「转型」计画是基于企业、技术官僚系统、新殖民主义，甚至是无永续性的概念，这些概念不主张结构性转型，更不用说当然也没有纳入计算地球所能承受之生态的极限。我们生态社会契约质疑这些方法，并提倡有必要将社会生态转型植根于全球正义的逻辑中，这种逻辑对于生态转型的霸权计画具批判性与替代性。

## > 我们的原则与议程

在波哥大，在COVID-19疫情大流行之后的第一次面谈中，我们认同以下原则：平等、正义与社会再分配原则；关怀、相互依存与生命永续原则；补偿与互惠原则；以及民主、自决、多民族性、跨文化性与种族间的伦理原则。

我们也重申我们的目标，并建议延续下列主题和行动议程：

1. 我们致力于将社会中的关怀模式视为组织核心。

我们指的是所有形式的关怀：人与人之间的关怀、自我关怀，以及对与我们共同生活且相互依存在地球上的非人类的关怀。关怀是恢复人际关系和生态系统之平衡的基础。每个人在生命的某些时刻或阶段都需要被关怀，这是生活在父权/新自由主义的论述中，人们被阐述为身为自主的个体这种叙事，所系统性忽略的一个面向。关怀作为福祉的一个重要层面，应该由社会中的所有成员（不论性别）积极承担和分享，以解构原本女性被赋予责任的归属。也就是说，在父权体制下的妇女（尤其是贫穷、种族化、原住民，以及被边缘化的妇女）几乎承担了照护的全部责

>>

任，并在影响生活条件的再生产领域中负荷了过多的工作。我们重申，照护应被视为生活与幸福的基本任务，并应受到承认与重视。此件事的重要性，在这次的疫情期间再次显现出来。这且，再生产领域的中劳动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报酬，亦不会被纳入市场或国家领域，许多形式的照护都存在于资本积累的领域之外。事实上，这是建构超越资本主义逻辑的社会的种子。正如拉丁美洲的许多经验所显示，集体或社区承担照护与生命再生的某些方面，是建构公地的基础。这也表示了，国家应该制定照护政策，以加强这些社区空间，且承担更专业的照护责任，或促进照护系统的完善以此作为社福的核心。

2.我们认为，在全球南部公正生态社会转型的框架下，解决生态、内部债务和永续性的问题至关重要。

任何气候正义或社会生态转型都是不可能的，若我们忽视了对上述债务的赔偿和不公正制度的废除。COVID-19疫情的流行突显了债务问题，以及我们迫切需要实际解方的事实，这种解方不只是临时或非常短期的减免。为了达成目标，我们有必要透过整体性的策略来质疑及重新思考目前生态社会转型的地缘政治，以整体性、本体论的正义及赔偿来保证所有人能有尊严地生活。霸权式的过渡性提案不但没有减少地缘政治的差距，反而加深了全球北方对全球南部的殖民，以及生态债务的严重风险。为了能更进一步迈向具永续性的解决方案，我们有必要要求取消全球南方国家的外债、公民主导的审计，同时，我们也反复谴责与外债相关的暴力与政府之腐败。总而言之，我们的提案旨在将那些将生态债务赔偿和取消外债问题视为重新思考国际金融体系重组机会，并将这些贡献系统化，以环境和地缘政治正义的模式为基础来达成我们的目的。

3.我们行动的开始，将作为一个生态社会和跨文化之契约。我们坚持，没有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的生态社会转型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和环境正义被视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其目的则是社会经济转型。然而在短期内，一些过渡性的提案是必要的，包括引进全民基本收入，将公民权问题放在核心位置，并以累进税制为基础，以确保其可行性和正常运作。我们不该忘记，拉丁美洲国家的税制是累退税制，以间接方式或消费税为基础，主要影响了最弱势的族群。包括出现率很低的税源，还有巨额财富、遗产、环境破坏和财务收入等等，反倒都在国家税制中很少出现。最新

数据显示，拉丁美洲的逃税行为造成近3,000亿美元的收入损失（占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6.1%），27%的财富如同位在避税天堂，根本不需纳税。同时，疫情危机还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在我们的地区，前10%富有的人集中了55%的财富。从逻辑上来谈，财富集中与污染相关，因为全球最有钱的10%人口排放了几乎一半的温室气体。因此，引入全民基本收入是重新分配财富和减少贫穷的必要策略，但必须是朝向生活的非商品化、扩大免费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地的更全面转型的其中一部分。

4.我们都知道，要拯救一个国家不仅仅只需要国内人们的努力。「气候民族主义」和「国家主权」的论述往往掩盖了生态危机更深层的问题。为了让必要的政策对民众产生实际的影响、平衡社会力量，并应当代历史的重大挑战，我们必须发展新形式的政治对话与区域合作。此外，意识到公民社会的重要性，且使他们参与其中。我们捍卫多民族性和主权区域的整合，以地方经济为优先，目标是有选择性地与全球经济脱离。根据不同拉丁美洲组织的计画，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朝向建构区域财政协定的方向迈进，从根本上重新配置所有司法管辖区现行的的财政制度。如此一来，才可使制度朝向公平的方向发展，为急需的社会与环境改革打开大门，以减少许多长期存在的不平等。少了这些改革，我们就没有能实现公正和全面的生态社会转型的一天。

5.短期内必要的过渡政策，必须加入当地的生产模式共同考量。我们必须针对拉丁美洲目前的工业化进程，以及他们成为全球北方国家的全球工厂链的一环这个后果提出质疑。那些充满有毒毒素被牺牲区域的产生，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家的特定区域发展工业，不只是以出口为导向的主要开发模式。而这种情况好可能扩展至更多国家，因为中国与美国对于拉丁美洲国家在「天然资源」与劳动力的争论，只会使他们将继续需要更多原物料，并加剧商品的剥削。

6.这个议题也让我们思考，有哪些替代性的生产提案能让我们迈向考虑族群伦理，并质疑以支配和剥削非人类生命体的权力关系的其他回应。我们目前的模式是以人类为中心，将非人类生物归类为低等生物，并将其转化为服务人类与资本主义体系的物品、产品与私有财产。举例来说，畜牧业、渔业、制药业、旅游业和纺织业都将动物当作劳动力来剥削，或将他们转变为产品，只重视这些非人类生命的经济表现，却罔顾他们的生活品质 and 尊严。

7.生态社会转型不能仅限于能源问题。同时，我们必须对能源系统、生产与都市模式，以及与大自然的连结进行结构性转型：去集中化、去剥夺化、去商品化、去分散化、去国家化、去阶级化、去种族化、修复与治愈。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构脱离以下这些产物与意识形态：化石燃料、对大自然的开发生，以及发展主义与受黄金国 (El Dorado) 传说启发的想像。我们必须了解目前的社会生态危机不仅加速气候变迁，也造成了多样性危机 (物种灭绝) 和难以维持永续性的食物体系。

8.能源是一种权利，而能源民主则是维持生命网路的基础。生态社会正义应该以消除能源贫穷为目标，并且打破在社会中持续有优先权使特权群体获得能源的这种权力关系。在短期内，化石燃料将成为一种过时的资产。在符合公正能源转型的情况下，希望将化石燃料留在地下，并缓和 (deescalating) 碳氢化合物的开发 (无论是新或旧形式)，上述做法都意味着意义上的断裂，将大自然赋予更多重的定义，使它成为不只是人类资源的供给者的存在。

9.有效的去碳化是必要的，但它应该摆脱被商品化的困境，而不是仍在全球南部巩固新形式的开采主义和造成更多区域的牺牲。我们必须注意「虚假的解决方案」，如可再生能源 (锂及矿产的转型)，以及所有排放补偿方案的限制和看见他们矛盾的部分。这些企业与国家在 COP 等空间达成共识，为全球南部实施具争议性的能源模式，包括：绿色氢能、智慧农业、碳市场、地球工程，以及其他旨在维持全球北部与全球南部之现有不平等权力关系的提案。

10.我们相信，单独的公正的生态社会作为一个全面转型的过程，不是、也不可能是对未来的承诺。转型已经发生在农村与都市的社区与土地上，透过许多经验以及世界各地的土地反霸权模式和错误解决方案的延续，而我们知道这是不够的。我们急需规划并加强这些与社区能源、农业生态计画、都市花园、分布式发电及替代性经济等相关的计画来加强达成目标。

11.转型的核心支柱是推广生态农业，透过在城镇建立并推广生态农业绿带改变农业食品体系，从而创造就业机会，并保证健康、安全且便宜的食物。此外，这将会因为生产和分销系统的改变，从而也促进自治和粮食主权。这项计画其目的在于赋予小农民和团结生产者所使用的当地生态

农业市场的权力，以让结社和社区文化更丰富，并使公民感到对生产、参与式认证或保证系统和消费有 (共同) 责任。

12.多数我们生活的城市，是被投资房地产的计画所影响和规划的 (另一面是房价的与都市缺乏绿地的问题)，此外，都市也同样被以车为本的交通建设主宰 (公共运输不足且过度拥挤)。这种特性让都市生活成为核心区域，而我们强调，这种大都市的生活方式应该彻底被改变，都市应该被郊区化。因为在大城市中，人们几乎缺乏与大自然的联系。在南方生态社会与跨文化公约中，我们提出「生态正义城市的权利 (right to a city with ecological justice)」，以改变我们在都会区的生活、饮食、行动及改善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方式。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们提倡一种新型的生态与民主都市主义，能够在以下方面产生有效的社会环境改变：水资源的代谢 (公平的水源与水源治理)、都市流动的动态性 (改善废弃物与污染管理、促进都市农业与直接与小规模生产者接触，来推广具流动且永续的当地健康食品)、都市基础建设 (无障碍空间、亲近生态与可负担的房价，以及解决社会空间设计所造成的种族隔离与贫穷问题、贫困、不平等、暴力等问题的循环)。

13.虽然当地致力于为生活而转型、加强自治，以及要求国家在法律上、文化上、领土上和预算上尊重并保证这些都是必要的条件，但它们需要在不同的规模 (区域、国家、拉丁美洲和国际) 上扩大和加强。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们必须继续向前迈进，找出并反抗共同的敌人，同时也要找出转型斗争的共同论述与政治架构。国际主义和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经验交流，是避免政治孤立和提供更强大的全球回应的根本。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要找出转型斗争中不同类型的盟友，包括不同政府层级的行动者，但始终尊重生态领土斗争的主角地位。

14.最后，我们深信南方生态社会与跨文化公约其中的这部分：在法律上承认大自然的权利。换句话说，人类必须承认大自然是权利的主体 (而非单纯的客体)，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并尊重大自然的节奏与能力。这也意味着迈向关怀的伦理，在关系本体论及新的气候挑战的框架下，大自然与人类的互动须被定义为种族间的伦理。若能具备思考的多元性，以复数世界的角度来思考人类与其他非人类有知觉的生命之关系。

总而言之，我们的目标是为建构一个真正公

>>

正的区域与全球转型正义，而这需要大众的参与和想像力，以及不同世代与类型、社会与跨文化团体、女性主义者与环保社会运动人士之间在议题上的交织讨论。毫无疑问，这不仅需要对所有问题进行深度的辩论，还需在重新定义团结、互惠、平等、相互依存和生态依存的多边主义的讨论与地缘政治的基础上，建立永久性的南北和南南政治对话。

南方生态社会与跨文化公约对区域内正在进行的改革过程抱持敏锐且开放的态度，对未来抱持憧憬、希望和力量。但当然，我们也意识到将我们往后拉扯的力量与寡头政治的施压。我们将继续在复数世界中推动抗争与提案、批判与另类方案、抵抗与重新存在。为此，我们恢复了近数十年来透过不同斗争而形成的基本叙事和概念，如：自然的权利、美好生活、重新分配的正义、关怀、正义过渡、自治、后开发主义、生态领域女性主义、粮食主权和自治，而我们将会始终与这些

概念并肩而行。

我们不只是维护任何公约。我们的公约不是霸权的绿色盟约，不是主导者之间的协议和交易，而是与地球的公约。它来自于全球南方，也是为了全球南方，更是对地球上任何一片土地的承诺。

*波哥大宣言是在2023年3月在哥伦比亚波哥大举行的南方生态社会公约年度大会之后起草的。有关南方生态社会公约的更多资讯，请访问其[网站](#)或其[X](#)、[Facebook](#)和[Instagram](#)。*



# > 奈及利亚社会—生态替代方案宣言

奈及利亚社会—生态替代方案联盟



出处：  
Breno Bringel，奈及利亚阿布贾，2024。

奈及利亚正面临着重大的社会与生态威胁。在过去几十年间，该国面临的挑战急遽增加，在各个层面影响着奈及利亚人的福祉，乃至生命。尽管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最舒适的气候和最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但由于气候变化加剧、生物多样性下降、污染和其他生态破坏，这些大自然的馈赠正濒临崩解。这几十年间，不计后果而缺乏监管的矿产采集，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名的系统性环境退化，糟糕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以及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影响，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这个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生态威胁。各方面的生态系统都在恶化，这个社群正处于危急时刻，未来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尽管这些威胁昭然若揭，奈及利亚联邦、州与地方各级当局仍无动于衷，不顾当地人民的权益，不断加速不计后果的开采以及系统性地破坏自然环境。

我们在此提出的《宪章》，是为呼吁奈及利亚社会—生态格局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其中提供了可持续、公平与公平的社会—生态秩序的愿景与蓝图，并将人民的福祉与自然环境的维护视为首要考量。

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整个国家大部分的森林都消失了，空气越来越有害，水源也受到严重

污染。尼日尔河三角洲，这个过去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破坏生态的碳氢化合物污染。沙漠化肆虐，干旱已司空见惯；水体正萎缩、消失；洪患加剧、且更频繁。有鑑于此，我们此时必须果断、迫切地采取行动，《宪章》概述了一个计画，来对应这些急切的挑战。

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生态完整、社会公正，同时具有经济福祉的奈及利亚。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奈及利亚，在这里，自然的权利受到尊重，社群得以掌控自身的资源，并享有资源民主，每个人都能拥有干净的空气、水和健康的环境。利基于环境正义、参与式民主与可持续发展原则，这份宣言概述了一个实现此一愿景的途径。我们设想一个奈及利亚，在此，奈及利亚人在他们的环境中推动变革。

## > 奈及利亚社会—生态替代方案宪章的核心原则

《宪章》以下列核心原则与意识形态准则为基础：

- **生态正义**——这个原则承认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对贫困和边缘化社群的人民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并推动在国家 and 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应对措施中，认识到这一不成比例的影响。

>>

•**人民参与**——这个原则强调积极和有韧性的社群的出现，这些社群有权参与影响其生活和生态福祉的所有决策过程。

•**持续发展性**——这个原则承认原住民的韧性和知识，并提升他们在制定可持续的长期生态解决方案和实践方面的能力、文化和技能，以保护环境并促进进一步的可持续实践。

•**问责制度**——这个原则强调了企业和政府实体对其生态足迹负责的必要性。它建立在一种坚定的信念之上，即公司和政府必须遵守既定的不造成伤害的规定和原则，违反这些规定和原则时要受到惩罚，并对其活动造成的任何损害进行赔偿。

•**团结与合作关系**——这个原则承认促进世界各地不同社群和运动之间的团结与合作的价值，其总体目标是为生态转型和保护地球建立强大、充满活力和团结的力量。

## > 我们的诉求

### 一、干旱与沙漠化

近几十年来，奈及利亚北部各州越来越常遭遇干旱。这些长期低于平均水平的降雨无法满足作物和牲畜的用水需求，造成整体社会经济福祉可怕的损失。受影响地区的原住民主要是农民，由于作物歉收和牲畜死亡，他们的收入大大减少。

干旱还反应在可能对原住民造成危险影响的，严重的健康风险之上。用水紧张和缺乏足够的营养导致营养不良等健康问题，特别是在包括儿童和老年人在内的弱势群体中。干旱导致的作物歉收和水资源短缺造成的总体贫困和不稳定迫使农村人口迁移，引发冲突并造成社会经济挑战。

气候变化、过度放牧、森林砍伐和不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方式，加上长期遭受干旱的影响，导致奈及利亚北部几个州出现沙漠化现象。这导致耕地流失，危及粮食安全和生计。有记录显示，沙漠化已经影响了前线各州约75%的土地，约佔奈及利亚总土地面积的43%。据估计，沙漠每年从奈及利亚东北部向西北部扩展600公尺。据同样估计显示，奈及利亚北部约50%的水体因干旱和沙漠化而大幅萎缩。乍得湖的萎缩也部分归因于这些相同的根本原因。

至关重要的是，政府应立即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减轻干旱和沙漠化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并采取其他政策措施扭转这个趋势。

与此一致，我们要求：倡议造林与再造林，协助社群适应变迁，以环境可持续性作为土地管理的首要目标，以及发展水源涵养计画。

### 二、洪水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的数据，洪水是奈及利亚最常见和不断发生的灾害。至少从2012年开始，奈及利亚就经历了反复出现且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为全国各地的社群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2012年的洪水是近年来最严重的洪水之一，影响了奈及利亚36个州中的30多个州，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并对房屋、基础设施和农田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这一事件标志着，该国所面临的生态挑战持续在加剧。

在随后的几年当中，严重洪水的模式持续存在，几乎每年都发生重大事件。洪水通常是由长时间的强降雨、城市排水系统不良、森林砍伐和大坝放水所造成。2018年和2020年的地震破坏性特别大，影响了大片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这对奈及利亚社群造成深远的影响。洪水不断造成人民的死亡，家庭流离失所，道路、桥梁和学校等重要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农业部门受到严重影响，农田被淹，作物被毁，牲畜损失，导致农民经济困难，造成全国粮食短缺。此外，水传播疾病和清洁水供应中断都导致健康风险有所增加。

尽管这些影响正在加剧，但政府仍然未能设计出既有效又可持续的应对措施。当局的反应主要是提供基本的紧急救济和预警。这些措施往往效率低落，不足以充分减轻洪水的影响。当洪水警报广播时，没有相应的协力得以支持需要搬迁和生存受到威胁的社群。

与此一致，我们要求：建设防洪基础设施、保护湿地、重新安置重灾区、经济援助、改善简单的预警系统以及应对气候变化。

### 三、森林砍伐

奈及利亚是世界上森林砍伐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据联合国估计，每年有3.7%的森林遭到破坏。为了迅速扩大农业而开垦土地以及合法和非法砍伐木材——这主要与腐败和执法不力有关。奈及利亚的森林复盖率从20世纪60年代的40%，急剧下降到不足10%。随着森林砍伐速度的增加，今天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森林砍伐威胁到生物多样性，加剧气候变化，破坏水循环。森林复盖的减少不仅对野生动物产生负面影响，也对依赖森林为生的当地社区产生负面影响。

最近出现了对森林的新威胁。奈及利亚的森林日益被视为填补各州金库的另一个创造收入的来源。这促使为了货币价值而砍伐森林的行为前所未有的增加。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全球缓解气候变

化的努力导致了新一波森林「商品化」和「攫取」它们，借此产生虚构碳信用额度的价值。以货币来评估森林的价值，就会陷入一种陷阱——如果自然无法产生经济价值，就无需保护。

与此一致，我们要求：社群主动保护森林，结束自然的金融化，结束种植园扩张，重新造林。

#### 四、水权

在全球，仍有数十亿人无净水可用，其中，有不成比例的妇女、儿童和社会底层等弱势群体不得不承受这些痛苦，并需要花费高昂的费用来获得这一必需品。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匮乏和稀缺性导致公共卫生、安全和人民整体福利的恶化。在包括奈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水权危机更为严重。在这些国家，经济管束、基础设施不足、新殖民主义阴谋、环境挑战和治理的系统性失灵，使水权成为迫切的国家和环境的危机状态，并明确体现了社会中严重的不平等。现在的奈及利亚，在水资源的公共所有权和私人控制之间的争斗中，关于水应该被视为一种公共产品还是一种经济商品的争论还在进行。

必须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结构的殖民强加创造了最初的条件，最终导致了奈及利亚目前正在经历的水资源挑战。这些政策促进了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剥削，为后续将水作为商业资源来管理的后殖民政策开创了先例。气候变迁的影响和大量的污染，特别是矿产与碳氢化合物开采的后果，都加剧了对供水的压力。

我们大胆地宣称，水权是伦理、社会和正义问题。我们注意到，奈及利亚是联合国承认享有水和卫生设施的普遍权利（2010年第64/292号决议）的签署国。此外，奈及利亚水体的污染是对自然权利的侵犯，自然权利承认河流、森林和生态系统是具有权利的实体。

据此，我们要求：下放水管理权，反对水的商业化，承认获得净水是一项人权，严格制裁污染水的行为，承认自然的权利。

#### 五、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恢复

奈及利亚拥有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从热带雨林和稀树草原，到沿海红树林和湿地。这些生态系统蕴养了各种各样的微生物、植物和动物，包括许多地球上其他地方找不到的物种。奈及利亚有超过864种鸟类、117种两栖动物、203种爬行动物、775种鱼类、285种哺乳动物、4715种维管植物和许多未记载的物种。

而奈及利亚的生物多样性受到工业化农业（特征是过度使用农用化学品、过度耕作、单一栽培等）、森林砍伐、土壤退化、污染、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和气候变迁的严重威胁。其他风险包括人口过剩、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经济发展不佳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和政策效率低下。

为了应对农业产量的下降，政府允许使用基因改造生物体（GMOs）和化学肥料以及杀虫剂，这进一步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和环境。多年来，奈及利亚农业部门对农用化学品的依赖一直在增加，奈及利亚有80%以上的农民目前使用无机农药和化肥。农民不知道这些农药的成分，而且往往不按照规定使用。

我们要求采取并且推广生态农业，以解决该国面临的生物多样性挑战。生态农业是一种全面而综合的方法，同时将生态和社会概念和原则应用于农业和粮食系统的设计和管理。它优化了植物、动物、人类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也解决了对社会公平的粮食系统的需求，在这个系统中，人们可以选择自己吃什么，以及如何和在哪里生产。

与此一致，我们要求：走向生态农业，增加对小农的支持，建立《生物多样性公约》，采取预防原则，保护保护区，取消所有植物种子和食物的专利权。

#### 六、矿业与固态矿产

尽管奈及利亚在各地开采锡、铌铁矿、钽、黑钨矿、铅、锌、金、煤等矿物，但其对奈及利亚经济的贡献却微不足道。奈及利亚的矿产开采仅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3%。然而，近年来，奈及利亚政府积极寻求通过振兴采矿业，使其经济多样化，摆脱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政府的推动带来了一系列新措施，例如借由监管改革，将采矿制度纳入法规当中，如2007年的《奈及利亚矿产和采矿法》和2011年的《奈及利亚采矿条例》。

近期，人工小规模矿产采集在该产业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这种采集主要使用原始技术从次生和原生矿石中收集和提炼金属和矿物。人们因为贫困而参与此种非正式采集，而这样的采集方式不仅会破坏环境，也对工人以及社群的健康和安全造成威胁。无论是人工采矿还是政府批准的大规模采矿活动都具有相同的负面影响。矿产采集对环境产生各种影响，包含土地退化、侵蚀、生态扰动、自然植物群的破坏、空气、土地和水的污染、健康风险和辐射危害。

开发、采集固态矿物主要造成的全球性问题，是其对气候变迁的影响。在它们的放射性衰变过程中，某些矿物会自发地衰变，释放辐射以及对全球温

度产生负面影响的多余能量。固态矿物的开发和采集本身也会产生有害气体，例如甲烷，而这可能会造成火灾以及危害环境。

为了开发与采集固态矿物，需要清除大量的地壳植被和植物。裸露的土地相对于复满植被的土地，更容易受到沙漠侵蚀，并对人类、动物、植物、农业生产力、土地使用/规划，特别是濒危物种产生负面影响。土地退化的影响包括风化、侵蚀、沟壑形成和块体运动，这些都是开发与采集固态矿物会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些问题可能源于矿山尾矿、垃圾场、过度的挖掘、废弃的矿坑以及未能恢复开采过的土地。

有毒、致癌和其他有害金属以及矿山倾倒和尾矿会随着矿产采集而破坏生活环境，对人们的健康、生活和文化行为造成负面影响。这些污染物会污染空气、水和土壤，对人类、动物和植物造成伤害。在Zamfara州——金矿开产地，人们接触到汞而损害中枢神经系统，导致眼睛、皮肤和胃炎等问题；呼吸系统疾病；失眠；易怒；无力行动；头痛；虚弱；以及体重下降。

为了解决这些弊害，我们要求：确实执行采矿法规，给予受到影响的原住民自由、优先和知情同意的权力；对奈及利亚的矿产进行适当研究；遵守国际最佳做法，包含除役和禁止采集区。

## 七、能源转型

全球能源工业占据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73%，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来源。因此，能源转型应侧重于从具有高排放量的能源，转向风能、太阳能和水力等可再生能源。目标必须是从源头上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以便大力减缓气候变迁所造成的影响。奈及利亚与其他国家一同制定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这些目标被列入各个国家发展框架中，例如2021年国家自定贡献（NDCs）的目标，是在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

能源转型对于实现可持续的未来至关重要。然而，有些问题在能源转型的全国对话中并没有被解决。首先，转型的必要性是一个与正义相关的议题。奈及利亚和其他受气候变迁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其对造成气候危机的历史排放量是最小的。在这方面，历史上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必须承担能源转型的最大责任，包括提供资金。因此，我们对转型的态度必须从正义的角度出发：它必须解决历史上的伤害，创造补救的空间，并满足社群的能源需求。

奈及利亚面临的一个重要困境，是如何获得人民烹饪时所需的能源。木质燃料是许多奈及利亚人的主要能源来源，超过70%的家庭依靠它来做饭和取暖，特别是农村地区，因为那里难以获得替代能源。由于

需要砍伐树木以用作柴火，木质燃料的使用助长了森林的砍伐。砍伐森林反过来又减少了可吸收二氧化碳的树木数量，从而增加了大气中的碳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寻求所谓的转型矿物以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绝不能强化了与过往矿物燃料采集时同样的不平等和滥用。奈及利亚必须有意识地避免陷入另一种重现同样的剥削性生产关系，并在全国范围内扩大牺牲区的能源途径。

与此一致，我们要求：包容性政策制定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工作转型、薪酬、环境修复和干净能源的获取。

## 八、石油与天然气的开采

1956年以来，尼日尔河三角洲不断地进行石油的商业开采。从最初的几口陆上油井开始，石油开采业务迅速扩张，活跃的石油开采地点遍布于尼日尔河三角洲和拉哥斯州。由于石油以及天然气大规模的探勘与开发，尼日尔河三角洲是一个巨大的油气田。该地区的探明储量为192万亿立方英尺，佔据全球天然气产量的绝大部分。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为奈及利亚创造了巨大的机会，使其在国家与地方都赚取了巨额收入。

尽管有钜额的碳氢化合物收入，但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进行开采的社群条件却惊人的糟糕。生活在这个石油和天然气产区的4000多万人并没有从他们的土地、河流和小溪下面所开采出的大量资源中受益，这些收入非但没有改善福利、基础设施、医疗、教育和安全，反而造成了不寻常的贫穷、冲突、压迫以及未开发的状态。

该地区的主要问题是轻率的碳氢化合物开采行动所造成。例如，奈及利亚每年生产的35亿立方英尺伴生气中，有25亿立方英尺（70%）被燃烧掉。伴生气直到现在依旧持续燃烧，这并不是因为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而是因为石油公司和奈及利亚政府不愿停止这种行为。石油公司尤其认为，继续燃烧天然气比建立管理天然气所需的基础设施更便宜、更方便。终止天然气燃除的最后期限持续从1979年推迟到2030年，甚至可能是2060年。即使在法院判决宣布天然气燃烧是非法行为之后，政府宁愿石油公司支付微不足道的罚款，也不愿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来结束天然气燃烧。

碳氢化合物产品从不同的提取点到港口，再从港口运往欧洲、美国和其他地方，导致长达7000公里的管道被埋在尼日尔河三角洲的土地、沼泽和河流下面，有时就在人们的农场和后院。某些管道已经埋了40多年；由于管道的老化与腐蚀，管道时常破裂，这个现象令人担忧，泄漏的原油破坏了农作物，毒害了

河流，污染了溪流，使整个社群流离失所。更糟糕的是：有时破裂的管道会在大火中爆炸，燃烧数天，烧毁整个社群和他们的生计。

随着近70年的石油开采而来的，是对环境、生计和人权的毁灭性影响。在尼日尔河三角洲经营的最大的跨国石油公司——壳牌、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雪佛龙和埃尼——已经制定了完善的计划，例如出售资产、进入更深的水域、或干脆离开该地区。当他们离开，奈及利亚公司买下这些石油巨头留下的油田时，没有规定谁需要对历史污染和相关的社会生态问题负责。当企业撤资、当地企业接手时，它们都立即否认对历史损害负有责任。对于石油生产和受影响的社区来说，撤资意味着让公司对污染负责的可能性变得更加遥远。■

由此，我们要求：对尼日尔河三角洲进行环境审核；对灾害作出紧急措施；石油公司撤资。

本宣言于2024年6月20日在阿布贾举行的奈及利亚社会—生态替代方案联盟会议上发布。《宪章》是现存的档案，奈及利亚人民将不时对其进行审查，以确定政策制定者的回应程度，并确保其对人民和环境的重视。

# > 欧洲新国际主义宣言

ReCommons Europe



出处：[ReCommons Europe](#)，2020。

欧洲机构（整个欧盟和欧元区）在结构上是新自由主义、不民主且不平等的。它对于满足各国民众各种阶级的需求、要求与权利，以及各成员国人民之间的团结与平等来说是一种障碍。在对抗竞争逻辑，以及从生态转型的角度来看，欧洲各层面的斗争和建立另类方案就显得格外地重要。

我们希望将欧洲变成我们共同的家园，但在目前的框架下这还是个遥不可及理想。因此，我们提出一个方案，这个计画需依赖地方、国家和跨国层面的社会斗争，以不服从、打破不民主的手段对抗在欧洲的资本主义机构，并以全欧洲与民众合作的民主机构取而代之。

## > 共同欧洲「反叛」情境的主要特征

1. 我们需要立即透过在地方、区域、国家和欧洲各层级政府来处理，这些特定事物或议题（例如债务、移民政策、生态过渡、与全球南部包括「东欧」的新殖民协议等）的协调与合作，以此导向的长期合作的平台和不服从运动，来实现另类社会、环境和政治之目标。不同的政治社会运动者都应该对欧盟的条约、指令和决定展开不服从行动。他们也应该让世人知道，这些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实施替代政策并建立新的长期合作（是关于所有的特定事项）。

这种不服从行动可以基于现有的社会抗争和运动（范围扩所有领域，如劳工权利、货币政策、反种族主义等）。它也应该尽可能地展示在欧洲实施民主、环境和社会目标的实际潜在效率，与现有的条约和新自由主义政策是相互矛盾的事实。即便一个政治社会运动者是孤立的，但他们仍然可以透过使现有的政策和机构失去合法性的方

式，以替代的解决方案来抵抗原有制度，并在所有可能的层面公开提出人民合作和组织自治的新形式。

2. 国家层面的现有抗争应强调在抵抗国家统治阶级所主导之的政策，以及在与欧洲主流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制度之间的互动的方向上。为了打破资本主义霸权的情况，民众的谘询与群众动员应该着重于倡议实现具体的目标，以及为了对抗欧盟统治阶级与机构而提出的相应方案。这里所指的对抗，也包括实施防御工具，以对抗欧盟的反威胁和攻击，抑或政治攻势的倡议；对抗的目标是为动摇新自由主义的阵营，并为其带来拥有政治合法性的危机，并妨碍这些欧洲机构的运作。政治社会运动者必须尽快透过单边措施来实施这些方案，例如：在审计期间暂停偿还债务的方案；在特定税收基础上创造更多工作机会的公共政策方案；控制资金流动的计画；或一些与特定社会抗争和族群合作的社会化/国有化需求计画。

即便一个政治社会运动者是孤立的，它仍应自行实践这些计画，并透过呼吁整个欧洲（而非仅在其地理区域内）的民众动员。此外，也邀请其他社会运动者为这个试图将欧盟机构去合法化之过程做出贡献，造成他们机构的政治危机。

3. 这些防御性的工具和具攻击性的政治主张，必然涉及国家层级的公民政府与欧盟条约和机构的决裂。公民政府所采取的所有措施，都需要至少在国家层级上，与现有的主导性的欧洲政治和规则分离。我们必须清楚表明，我们所捍卫的并非基于「国家利益」，而是基于政治、社会、环境和民主的理由；并且，这些理由关系到目前欧盟内外的所有民众。

>>

我们捍卫民主控制的货币体系和货币的绝对必要性，因此也捍卫银行社会化和控制资金流动的必要性。这些措施与欧盟的条约和经济货币联盟 (EMU) 相冲突。民众政府可决定退出欧洲货币联盟及/或欧盟 (例如援引第 50 条)，或接受被驱逐出欧洲货币联盟或欧盟的挑战。

### > 启动制宪程序

制宪程序必须在所有可能的层面上被启动，旨在于欧洲建立与目前制度相左的方案，并发展新的政治合作可能。这个理想必须建基于一个共同的公众平台，以对抗欧洲和当地统治阶级和机构，以及排外主义的抵制。当然，这样的制度也须是有益于工人与所有弱势阶级的社会权利，以及重视对于环境的保护。

我们无法预测详细的情况，但举例来说，一个由协会、反叛城市、地区或国家所组成的联盟，可以发起一个「反叛选区程序」(关于全球或特定的功能特权)，甚至开放给从一开始就没有参与不服从程序的政治空间。这些制宪程序，依据相关情境与层级 (从市政论坛与网路，到与国际主义平台相关的国家或欧洲层级的制宪大会) 而有不同的形式，启动这些程序是为了创造新的合作，促进尚未开始此一程序的邻近政治行动者的破裂过程，瓦解「欧洲堡垒」(Fortress Europe)，并最终在欧洲与国际层级创造替代性的机构。如果某个政治行为体处于孤立状态，它应该为相关领土或功能发起这个「反叛组成程序」，并建议其他行为体加入这个程序。

### > 提案：应立即采取的措施

前述的每一点都需要即时的行动。主要的要求是关乎集体设计和民众取得必要的特定工具，并以不服从、对抗和启动组织程序，以及聚集可以运作这些程序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为主。

我们建议所有的进步力量 (工会、政治组织、协会、社会运动参与者等) 皆采取相似的目标：共同加强对资本主义的抵抗、对不民主的欧盟机构的批判，并共同提出具体建议以打破这些机构的霸权，重建新的民众合作形式。此外，还需更新、分享与普及相同的文本，例如 Altersummit 宣言与 ReCommonsEurope 宣言；鼓励在地方、国家与欧洲层面发起所有重要的倡议，以支持「反叛的选区程序」。也利用欧洲选举的机会，去影响举办政治活动与激发民众辩论，告知民众目前有何可参与的倡议与可替代旧有制度的改善空间，并将社会与政治力量聚集于此。■

本文转载了《欧洲新民众国际主义宣言》(Manifesto for a New Popular Internationalism in Europe) 的第九章 (欧洲的社会抗争、政治对抗和组成程序) (略有改动)。该宣言最初于 2019 年 3 月提出，由一群来自欧洲十几个国家的活动家和研究人员所起草，希望提出一个蓝图让人民和左翼力量有所行动。它是 [ReCommonsEurope Project](#) 的一部分，由两个国际网路 (CADTM 和 EReNSEP) 以及巴斯克工会 ELA 发起，目的是为欧洲人民左翼内部正在进行的战略辩论做出贡献。

# > 超越差异： 多元世界中的相似性

Lidia Becker、Christine Hatzky，Leibniz University Hannover，德国



出处：Anderson Guerra，2018，在Pexels.

**当**前是环境灾难、战争、去团结化和科技进步快速的时代，未来全球的走向令人难以预料。在新自由资本主义下，人和物被剥削的事实都变本加厉，也加速许多地球上人类与非人类的迁移与灭绝。鉴于目前地球所面临的这些挑战，我们认为应该「超越差异」(beyond difference) 来分析这些挑战，并依照 Anil Bhatti 的著作，发掘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相似性，并以此作为中介来激发这些概念发展的潜力。

## > 多元性：亲属关系、平等与相互连结

在具批判性的后殖民主义与性别研究中发展出来的差异性，对于解构不平等与阶级制度非常有用，但却忽略了对相似性的认知，也就是对于关系、类比、联想、同时性与空间，这些具共鸣与凝聚力建构社会实践的先决条件。安地斯山脉地区的原住民哲学 Sumak Kawsay 或 Buen Vivir 以多元性的形象，透过连结进行思考，以克服殖民与父权结构的实践。在「多元世界」(pluriversal world) 中，人类与非人类(合法性)主体的社会秩序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存。地球不被视为一种资源，

而是一种给予、一种生命的存在，且在这个世界观中，万物皆为相互关联的存在。

多元性的概念源自过程本体论，涉及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共同成长。在英美及欧洲地区发展的具批判性的后人类主义，也提出了相似的概念，从过往区分人与非人类的观点，转变为强调人类与非人类实体之间的亲属关系。这样的概念参考了拉丁美洲、非洲与亚洲的非殖民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但相较之下，它更重视地球未来的科技发展。与此相关的是关于地球可居住性的讨论，「地球人」在这个星球上有生存的机会，而囊括了其机会与危险的双面特质的人类科技，在这个星球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此背景下，相似性的概念变得重要，因为科技发展让机器与人类越来越相似，并加强人类创造力的矛盾性。

## > 少囉唆！多谈差异，少谈相似

对于以相似性为基础来分析非人类中心的多元性概念与后人类主义方法之间的关系，有某些研究文献是有

>>



关的。第一类是在拉丁美洲所讨论的观点，以各种原住民宇宙论（由 A. Escobar、M. de la Cadena、M. Blaser 和 A. Krenak 等人所着），以及在拉美研究中所探讨的共生（由 Sergio Costa 提出）与共存的概念为基础的观点。自古以来，在哲学与科学历史的讨论中，相似性的认知一再被强调为人类基本的认知功能，以及提供方向的实践（如模仿、仿效或模拟）。然而，有关相似性的讨论近期才出现在有关文化理论与文学研究的辩论中，而且至今仍未发挥足够其在认知学研究方面的潜力。

除了这些仍然含糊不清的方法之外，我们希望让相似性的概念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范式转移中发挥效用，并借鉴前辈思想家（B. Spinoza、G. Leibniz、G. Tarde、W. Benjamin、Marcuse 等等）的观点以此构成第二类研究文献的基础。到目前为止，人文与社会科学主要是以差异性为主要研究方向，这些有关差异性的理论基础构成了第三种，也就是结构主义，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概念（M. Foucault, J. Derrida, G. Deleuze）。以差异性为基础的观点，反映在后／去殖民主义与批判现代性之讨论中（D. Chakrabarty, F. Coronil, S. Hall, R. Grosfoguel）；而性别与同性恋研究中讨论，则共同构成第四个研究阶段的范式转移。在以跨学科为主线的领域中，第四阶段的研究学者也成功地发展了差异性分析的概念，在交叉性的概念下，以解构全球层面的复杂不平等现象（G. Spivak, M. Lugones），并捕捉到不平等在不同层面的上纠葛。有关黑人／有色人种的女性主义的工作（B. hooks, K. Crenshaw），则是在对于性别框架的意识上，铺陈了能更加深入理解特定种族和阶级的重要道路。

以差异性为基础的身分认同建构，从 1990 年代开始在全球辩论的过程中受到批评，部分原因是他们对文化面向上是以本质主义的方式来理解，意即他们拒绝其他更多可解释空间（S. Hall, H.K. Bhabha）。这种身分认同建构的方式，是「西方文明」文化优越性观念的核心，其基础是「自我」与「他者」这种简单又武断的身分认同建构，被支持基本教义与身分认同运动的群体所接纳。但，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差异为基础的认同概念是值得商榷的原因。我们认为，即使是以差异为基础、以人类为中心的概念，也需要透过非本质主义的方式来理解。

### > 多元性与扩展认识论之间关系的最后一环节

气候变迁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对地球生命所造成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状况即源于在启蒙运动（理性化）的过程，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被区分开来了（B. Latour, P. Descola），这样的观念并在现代社会学中被一再巩固。在此，我们上述所提的相似性的概念也有助于克服这种自然与人类／文化之间殖民式的二分法，并将人类理解为更大的复杂网路中的一部分。

这是第五项研究的基础，包括新物质主义（K. Barad）、后人类主义（D. Haraway, R. Braidotti）、肯定性生物政治学（V. Borsò）与科技女性主义（J. Wajcman,

F. Costa）。这些概念都开放给解殖取径的方法论与非西方的宇宙论使用，这也所谓我们在讨论复数思维时的关键观念。同时，非洲哲学也处理技术殖民性、技术、自然和人类的复杂交织状态；他们尝试辩论在一个多元世界中，讨论非殖民技术的可能性（A. Mbembe）。

所有上述研究方法的共同点是，它们皆重构了宇宙、地质、技术与人类之间的共感关系。相对来说，其他方法则亚洲哲学与量子物理学的发现，以及其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的适用性（K. Fierke），从而开启全球知识生产的多重连结。与科学与技术研究相反，技术殖民地角度（R. Camarena et al.）的特点在于其聚焦历史与基于地域专业知识的解殖过程，以及对「科技技术」（technology）的扩大理解，例如将识字能力视为殖民的一环（W. Mignolo）。

我们计画的特点在于由互补的观点，讨论并系统化发展这些不同的全球认识论。而这个认识论都是以关系的角度来思考，目的在于阐述一种新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以看待自然、人类与科技技术之间的流动关系。

### > 新（旧）本体论、科技批判与解殖主义的相似性

1. 自然：现代社会在文化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划界，是西方认识论的基础，也是在殖民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从人类与非人类主体之间的延续性与互惠性层面对其提出质疑。我们透过把对人类与自然资源的剥削合理化这事情二分法，并以关系对上复数世界的观点进行对比，这样的比对方式来自拉丁美洲的哲学，以及近代所讨论的「扁平本体论」其之内在固有观点，也是同时具微观与宏观、具有包容性思想。

2. 技术：科技技术的进步是为了开发与剥削外在的自然和人群，是殖民主义的另一个基础，也是父权体制的缩影。新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以及当今人类与科技的融合，唤起了我们对科技殖民的合理怀疑。例如，透过通讯科技的监控功能。然而，社会设计的可能性回击了这种怀疑。后人类女性主义将有机生命，以及包括科技在内的非有机物质交织在一起，并将他们定义为一种组合，意即他们对于科技技术成为我们生活中决策主体的现象，提出了质疑。

3. 人类：重视多元形式的社会，解构人类社会旧有的分类框架（以男性、异性恋和白人作为准则的框架）。我们应优先考虑在不同群体之间创造共同性，超越差异和外来性，达成群体共融与团结的目标。我们要讨论的是，从殖民主义开始、到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持续的剥削他者与与自然资源的行为，究竟在多少程度上造成了现今社会的差异性与生态危机。与此同时，历史和当代社会脉络也承受着被同质化的风险，例如：该如何抵抗极权体制排斥多样性的现象，就是其中一个我们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们概念是创新且具发展性的，透过多元性的过程本体论概念，以及基于相似性观点并透过一步步实践的

后人类方法，来进行跨学科的连接。我们将两者结合起来，从连续性的观点来发展自然、人类、科技技术之间关系的新概念。复数性与后人类的观点在处理西方现代性的概念、其普世主义以及其他与他们相关的概念时，也共享了对于后结构主义、后/解殖主义这种以「差异」与「另类」为基础研究方法的批判。按照现代性、理性、殖民性的逻辑，现代世界由阶层制与本质主义的二分方式组成（自我/他人、白人/黑人、男人/女人、文明/野蛮、主体/客体、心灵/身体、文化/自然、差异/相似）。

因此，差异性被宣称为与卓越的知识组织同等的范式典范，而相似性与模仿则在西方认识论的观点中被视为「不科学」，因而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原始的」（primitive）、「魔法的」（magical）、「接近自然的」（close to nature）与「前现代的」（pre-modern）。相对来说，我们的方法论将关系性的相似性概念，整合到解殖的范式中，扩展了对世界的多元认知，包含了对技术的批判，并超越了以差异性为基础的知识生产现况。■

来信寄至：

Lidia Becker <[becker@romanistik.phil.uni-hannover.de](mailto:becker@romanistik.phil.uni-hannover.de)>

Christine Hatzky <[christine.hatzky@hist.uni-hannover.de](mailto:christine.hatzky@hist.uni-hannover.de)>

# > 委内瑞拉与孟加拉的控诉：独裁者何时放弃？

John Feffer，政策研究所，美国



| 出处：Shutterstock.

在某个国家，执政15年、日益独裁的领导人被由学生领导的反对派拉下台政坛。在另一个国家，这位统治了11年、日益独裁的领导人，在近期的选举中操纵选举，使自己险胜，在遭到抗议时拒绝请辞。

第一个国家是孟加拉，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Muhammad Yunus 领导的临时政府取代了目前（再次）流亡印度的总理 Sheikh Hasina。与此同时，在第二个国家委内瑞拉，Nicolas Maduro 抵抗了美国、欧盟和其他国家要求他下台（如果不是国家的话）的呼吁。

为什么反对派在孟加拉取得成功，而在委内瑞拉却没有？两国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政府的制度权力、各自的石油储备规模、与美国的邻近性。但或许最关键的差别是时间。Maduro 很可能只需要几天、几周或几个月就会遭受和 Sheikh Hasina 相同的命运，也许他只是还不知道而已。

## > 孟加拉惊喜

Sheikh Hasina可能认为她的政权不可能受到撼动。作为孟加拉长期任职的总理，她拥有足以保护她的血统。她的父亲领导了反对巴基斯坦的独立运动，成为该国的第一任总统，被称为「国家之父」。她也有理由相信她的任期会顺利持续。孟加拉的经济在[过去15年](#)（包括2020年新冠疫情年）持续上升，在此期间，教育机会、儿童健康和总体预期寿命[都有所改善](#)，贫困率也[降低了一半](#)。

再来是Hasina在地缘政治上的敏锐度。她拥有邻国印度的 Narendra Modi 政府这个强大的盟友，也能够与中国保持相对良好的关系。

当然，她也有反对者。她将一些国内的反对者关进了监狱。她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成功翻盘。

首先，有大量的孟加拉年轻人离开了这个国家。2023年，超过五万名学生出国接受高等教育。在社会经济光谱的另一端，超过一万五千名孟加拉移民在2022年艰难地穿越地中海前往意大利，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孟加拉媒体不断在讨论「人才外流」的话题，而评论家也试图找出留住本土人才的方法。

当然，Hasina也担心人才外流。但是，每有一个年轻人离开这个国家，在街头抗议政府政策的年轻人就会减少一个。在失业率超过15%的情况下，孟加拉年轻人因无法享受过去15年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而沮丧，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有一个选择是去海外寻找更好的机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另一个选择是前往公务员部门，政府的工作薪水很不错，而且工作有所保障。

不过，政府多年来一直试图借由将近三分之一的工作机会分配给1971年参加该国独立战争的退伍军人的亲属，来减少工作缺额。要记得：总理的父亲是一名独立斗士，这是对那些重要支持者的一种奖励。

学生们在2018年成功阻止了这一个新的供养制度，但政府今年再次尝试通关，年轻人再度重回街头。到2024年8月初，共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是新一轮的反政府抗议行动。尽管最高法院大幅度地淡化了配额提案，但学生们持续施压，直到总理辞职并逃离该国。

这一结果与2014年乌克兰发生的事情惊人地相似，当时，年轻人等人在基辅市中心举行示威，反对腐败的总统Viktor Yanukovich。Yanukovich还与邻国的威权领导人建立了紧密的关系。Yanukovich随后逃离了他的犯罪现场，逃往俄罗斯，住在他据说花了5000万美元买下的一栋房子里。

当然，没有人想再制乌克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战争、领土损失、经济破坏。为了避免重蹈乌克兰的复辙，孟加拉将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新过渡政府的努力。

幸运的是，孟加拉组建了一支才华横溢、包容性强的团队，其中包括临时总理Muhammad Yunus，他是孟加拉乡村银行的经济学家兼创始人。Yunus一直是Hasina政府的目标，Hasina政府曾指控他犯下贪污与其他罪行。但这位小额借贷行动的创始人主要的罪行是与Hasina政府相处不融洽。

临时政府的其他成员包括两名学生抗议领袖Nahid Islam和Asif Mahmud，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在这种过渡时期很少有年轻人能够掌权。其他成员包含「人权活动人士、

法律专家、两名前外交官、一名医生和一名孟加拉央行前首长」。这群让人耳目一新的非政界人士的主要工作将是稳定国家局势，并为新的选举做好准备。

### > 委内瑞拉不意外

受够了Nicolas Maduro和他的窃盗统治方式的不仅仅是学生。根据选举前的民意调查和反对派在选区收集的选举后结果，超过70%的人口希望推翻Hugo Chávez的接班人。委内瑞拉不意外的是，Maduro宣布自己赢得了（对他来说）看似合理的51%的选票。

委内瑞拉出现了抗议行动。与孟加拉一样，政府试图透过杀人（[超过12人](#)），以及监禁反对者（[至少2000人](#)）来镇压反对派。政府发布的「敲敲打打」活动的影片中，有[恐怖电影配乐](#)，歌词是：「如果你做错了，他会来找你！（……）他会来找你！你最好躲起来！」反对派呼吁在8月17日举行国际抗议日，希望以此吸引居住在国外大约800万委内瑞拉人中的多数人参与抗议。

但与孟加拉有两个主要不同之处。在委内瑞拉，反对势力以政党为核心。其成立的目的是选举，而不是推翻一个非法政府。相对于动员人民上街头，这个政党更善于动员民众投票。与其他成功的反对派行动——比如乌克兰、塞尔维亚或菲律宾的反对派运动——不同，它并未发起任何如罢工、道路封锁等不服从运动。

第二，委内瑞拉的反对派是由老年人领导，其总统候选人Edmundo González今年已74岁。然而，真正的权力掌握在María Corina Machado的手中，56岁、正值壮年的她已经是政界老屁股了。她在抗议的方式上很精明，也知道委内瑞拉反对派的局限性。

相比之下，孟加拉的年轻人都是菜鸟。事实证明，这正是他们的优势所在，他们拥有无知的力量。他们不知道这些抗议是不切实际的，即使最高法院确实废除了糟糕的配额制度后，他们仍然在抗议，抗议，持续抗议。他们团结一致表达诉求——Hasina下台——尽管他们并不认为这真的能发生。

孟加拉的抗议行动是由无限的理想主义推动；委内瑞拉的抗议行动则受到经验丰富的现实主义的启发。有时候成功需要的是感性，不是理性。

### > 时间到了？

在Sheikh Hasina逃离孟加拉的前一天晚上，她的军队首领[决定不执行](#)向平民开枪以实

&gt;&gt;

施宵禁的命令。这种巴托比式的拒绝参战——我们军队不愿参战——可能是导致政府垮台的决定性因素。不过，军队仍然是临时政府背后的力量。

但请记住：实际上，正是学生们的决心使得孟加拉军队改变了立场。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表明委内瑞拉军队有计划做出相似的行动。反对派向军方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说军方放弃Maduro。但就在一天前，这位委内瑞拉领导人与军方官员一起公开露面。「永远忠诚」，他们齐声高呼，「永远不做叛徒。」

即便越来越多人上街，委内瑞拉的反对派依旧必须参与这种政治内部的游戏。[Jack Nicas](#) 在《纽约时报》上写道：

「密西根州立大学研究威权主义的政治学教授 Erica Frantz 的分析显示，在1950年至2012年期间，473名失去权力的威权主义领导人中，近三分之二是被政府内部人士罢黜的。为了对抗这种威胁，独裁者经常尝试政治学家所谓的『防止政变』（*coup-proofing*）：他们将安全部队分成各种分散的单位，借此防止任何一个分支机构积累过多的权力，同时也会促使军队间相互监视。分析人士说，这就是委内瑞拉的写照。」

Maduro应该知道，他能「防止政变」的程度有限。在几乎所有独裁者的政治生涯中，都会有这种时刻：就像1989年12月的 Nicolae Ceausescu 一样，他们看着自己认为是支持者的人群，却没有得到预期的掌声，只听到嘲笑。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们最好有一架直升机和一名忠诚的飞行员随时待命。■

来信寄至：John Feffer <[johnfeffer@gmail.com](mailto:johnfeffer@gmail.com)>

本文是美国政策研究所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的一个计画——由全球对话与外交政策聚焦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合作撰写的。

# > 全球气候正义与巴勒斯坦解放

Hamza Hamouchène,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荷兰



出处：Markus Spiske, 2019, 在Pexels。

**在** 2023年12月于杜拜举行的COP 28气候峰会上，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公开表示**：「对巴勒斯坦人民施加的种族灭绝和野蛮行径，是那些因气候危机而逃离南方者所面临的命运……我们在加萨所看到的，是未来的预演。」

他是对的。如果我们不组织起来，并积极反抗，加萨的种族灭绝可能预示着更坏的事情即将来临。帝国及其全球统治阶级愿意牺牲数百万黑色和棕色皮肤的身躯，以及白人工人阶级，以继续累积资本，聚集财富，并维持他们的统治。

## > 将成本转嫁给自然

资本主义始终是一个无偿系统。成本系统性地外部化并转嫁到其他地方：社会再生产中女性和照护者承担的主要是无偿的成本；从城市到农村；从北方到南方，造成牺牲体系区域的形成，这一动态是通过非人化、他者化和种族主义来促进的；以及将成本外部化到自然界，将其视为可以支配和掠夺的实体，甚至被视为废物的排放槽。这导致了生态和气候危机。

我们所经历的全球气候危机的影响在阶级、性别和种族上有所不同，并且在城市与农村、全球北方/帝国核心与全球南方/边缘之间也存在差异。在殖民者和被

殖民者之间的线上，也能明显区分这些影响。

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但其影响和脆弱性存在巨大差异，因为以色列的殖民者一殖民政策已经掠夺并控制了大部分资源，从土地和水源到能源，并且在巴勒斯坦人的背上，与帝国主义力量的积极支持下，发展了可以帮助缓解气候危机影响的技术。

## > 全球气候正义与巴勒斯坦解放

在加薩的種族滅絕背景下談論氣候與生態問題，或許會讓人感到不合時宜，甚至不恰當，但我認為氣候危機與巴勒斯坦解放鬥爭之間存在重要的交集。事實上，沒有巴勒斯坦的解放，就不會有全球氣候正義：巴勒斯坦的解放也是拯救地球和人類的鬥爭。這並不是簡單的口號，正如我在以下段落中所解釋的。

在加萨的种族灭绝背景下谈论气候与生态问题，或许会让人感到不合时宜，甚至不恰当，但我认为气候危机与巴勒斯坦解放斗争之间存在重要的交集。事实上，没有巴勒斯坦的解放，就不会有全球气候正义：巴勒斯坦的解放也是拯救地球和人类的斗争。这并不是简单的口号，正如我在以下段落中所解释的。

首先，当今的巴勒斯坦完美地展现了当前体系的丑

陋，并汇聚了其致命的矛盾。它还显示出向大规模使用残酷暴力的趋向。葛兰西曾说过：「危机恰恰在于旧的正在死亡，而新的无法诞生；在这段过渡期，出现了各种病态的症状」。

其次，今天在加萨发生的事情不仅仅是种族灭绝。我不确定我们是否拥有正确的术语来描述当前对巴勒斯坦人施加的所有毁灭和死亡。尽管如此，现在发生的事情也是**生态灭绝**，或者有些人称之为「集体灭绝」，即对整个社会和生态结构的消灭。

第三，加萨的种族灭绝战争与其他战争一起凸显了，战争和军事工业复合体在加剧生态与气候危机中的作用。美国军队本身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体制性排放者**，其排放量超过丹麦或葡萄牙等整个西方国家。在加萨战争的头两个月，以色列的排放量**超过**至少二十个国家的年排放量。其中约一半是由于美国向以色列运输武器造成的。美国不仅是种族灭绝的活跃参与者，也是发生在巴勒斯坦的生态灭绝的重要贡献者。

第四，这是我主要的论点（基于Adam Hanieh和Andreas Malm的研究），我们无法将对化石资本主义和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的斗争与解放巴勒斯坦的斗争分开。以色列作为中东的欧美殖民地，是一个帝国前哨站。Richard Nixon总统时代的美国国务卿Alexander Haig曾**直言不讳**地说：「以色列是世界上最大的美国航空母舰，无法沉没，甚至不载有一名美国士兵，位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地区」。

### > 中东与全球化石燃料体系

中东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重要性不可言喻。如今，该地区不仅在调解新的全球贸易、物流、基础设施和金融网路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还是全球化石燃料体系的关键节点，并在维持化石资本主义的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其石油和天然气供应。事实上，该地区在全球碳氢化合物市场中仍然是中心轴心，2022年**全球石油生产的总额**约为35%。以色列也一直在寻求成为东地中海的能源枢纽（透过新发现的天然气田如**Tamar** 和 **Leviathan**）：这一愿望得到了欧盟在乌克兰战争背景下试图多元化能源来源以摆脱对俄罗斯依赖的支持。在战争的最初几周，当以色列授予多家化石燃料公司探索更多天然气的许可时，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并未构成任何障碍。

目前美国在该地区霸权的两个主要支柱是以色列和富裕的海湾石油君主国。作为首要的区域盟友，以色列在维护美国主导的帝国在该地区（及其他地区）的统治和对广大化石燃料资源（主要是在海湾和伊拉克）的控制中发挥了基本作用。正是在这一框架下，我们需要理解美国及其盟友在政治和经济上将以色列整合进入该地区的努力，这一努力是基于主导地位的：包括先进的技术、武器和监视设备，以及海水淡化、农业生产、能源等领域的发展。

以色列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正常化协议可追溯到1978年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的《大卫营协议》和1994年约旦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第二波正常化则是在2020年由Trump促成的《**亚伯拉罕协议**》，包括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

在10月7日袭击之前，预期沙乌地阿拉伯和以色列在美国的保护下将签署一项类似的协议，从而巩固美国在该地区的帝国计划。这将彻底终结巴勒斯坦的事业。因此，巴勒斯坦解放斗争不仅仅是一个道德和人权问题，而是根本上和本质上是反对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和全球化石燃料资本主义的斗争。在深度种族主义的以色列殖民地被拆除，以及反动的阿拉伯政权（主要是海湾石油君主国）被推翻之前，将不会实现气候正义。

巴勒斯坦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化石燃料资本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全球战线。我们所有人，无论是气候正义运动家、反种族主义组织还是反帝国主义的倡议者，都有责任积极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斗争，并捍卫他们以任何必要手段抵抗的不可否认的权利！我们面前的任务非常艰巨，但正如Fanon曾经勉励我们的，我们必须在相对的默默无闻中，发现我们的使命，实现它，并确保不背叛它。■

来信寄至：  
Hamza Hamouchène <[hamza.hamouchene@gmail.com](mailto:hamza.hamouchene@gmail.com)>

这是一篇稍加编辑过的演讲版本，由Hamza Hamouchène在2024年7月13日于伦敦举行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解放节上发表。

# > 西班牙的社会运动： 二十年来的转变

Marta Romero-Delgado和Andy Eric Castillo Patton，马德里康普斯顿大学。  
Gomer Betancor Nuez，国际远距教学大学，西班牙。



出处：  
Breno Bringel，西班牙马德里康普斯顿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学院壁画，2024。

过去十年来，西班牙的社会运动研究蓬勃发展，不只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更突显了复杂网路中多元声音与不同议程的跌宕。许多研究主要关注「愤怒者运动」（或称15M运动）和它在2011-2012年后带来的各方影响。然而，也有另一群处在愤怒者动员核心或边缘位置的其他社会运动，他们所经历的重大改革经验是相较之下容易被忽视的。

基于以上的考量，我们从跨学科的视角出发，借此思考过去二十年的西班牙社会运动面临了哪些对话与变革。我们合着编辑了一本探究社运起源与[重组过程的书](#)。本书描绘了西班牙女性主义与LGBTQ+运动如何与劳工与反种族主义运动对话，并且同时关注反战运动和平运动带来的严峻挑战，以及极右派运动重新浮上台面后，企图透过使西班牙政治「欧洲化」来改变国会当前的变革走势。

## > 跨学科、对话与全球视角

社会运动研究中有一块由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心理学和应用哲学等其他社会科学所构成的交叉领域，各学科都带入了不同的问题和分析视角。然而，我们的著作也强调社会运动的研究需要

从贯时性的切入视角去思考社运者的声音。因此，在我们所编撰的这本书中，我们透过跨学科的视角与钻研历史与政治研究的学者对话。尽管在欧洲已经出版过使用这种研究取径的书籍，但本次计画所提供的对话视角开启了统合记忆、遗产以及——最重要的——反思性变革和预测的可能性。除此之外，此书的部分章节也提供了社运人士视角的分析。

尽管本书的多数作者都拥有学术背景，但他们的研究连结了生活经验，探讨理论与实作如何在性别、性、种族、劳工权益、社会冲突和和平议题等领域互动发展。我们的书更进一步关注近期西班牙社会运动中所带来的欧洲化性质，以及国内针对这个现象的研究，其中包含了这个主题中的全球化进程。我们所挑选的案例突显了西班牙充满争议的政治与我们书中以跨学科取径分析的区域化以及全球化趋势之间的关系。

## > 西班牙的社会运动

若想了解全球结构，就必须先了解各地的情形。西班牙所经历的佛朗明格独裁政权（1936-1975），影响了后续由精英主导的民主改革，以及西班牙政治与政策



的改革动力。政治体系的威权遗产和这种由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决定了近几十年西班牙社会运动发展的背景与生态，因此大多数西班牙社运的背景都镶嵌在过去独裁政权正式或非正式的遗产中。直到这个世纪之交或再更近期的时候，社会运动的样态才逐渐转向，开始出现外于政治圈的行动者。在这段演变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义务役的结束，这世纪之初女性堕胎权的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动员，包含了对LGTBIQ+权利的肯认，以及在2010年代开始的转型正义。然而，近期极右翼的活动及政党，象征着后弗朗明哥主义支持者的出现，他们所主张的极端民族主义以及极端保守主义也正与欧洲与美国支持者的全球网路相呼应。

因此，若想研究在欧洲化与全球化发生之前和发生的过程中，各个多元却又相关的社会运动所采取的路线差异，就必须将西班牙过去政治和文化所带来的影响视为分析的基础。西班牙的民主化进程不只处理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议题，同时也处理了国内与政治经济精英中仍存在的后多佛朗格主义壁垒，这些都是过去相关研究容易忽略的部分。

### > 当前与未来研究的不连续性与路径

西班牙社会运动研究的黄金时期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并促进这个领域的发展。因为15M运动，我们有机会了解那些促使公民参与的社会运动以及外于政治机构的民主改革声浪之间的关系。不只如此，它也标示着学术界的一个转折点。这个现象让西班牙成了国际间社会运动研究的核心，不只因为国内对社运有着很好的回响，也因为西班牙的社运吸引了许多国际间的学者将西班牙的例子当作研究对象。

由各种研究计画所构成的研究领域，让西班牙的研究者不只更加国际化，也更进一步与欧洲网路接轨。西班牙社运研究国际化和欧洲化的现象反而促进了与全球南方其他研究领域的地区性与国际性对话，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地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这个领域提供了一个针对国际情形的地区性取径和社会运动挑战的汇聚点。结合了学术和社运人士针对自身所参加的社运的研究，这种多元视角促使了一本将理论与反思性实作相结合的书诞生。

尽管我们的提案并不像其他研究社会运动的取径那般创新，但我们仍希望可以基于我们书写的立场及对象，给予这个领域一个诚实且严谨的贡献。本书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启与西班牙社会运动的贯时性与对话性研究以及提供一本可以扩展既有社运知识的手册，内容包含了各类社会运动、联盟组织，以及各地对全球趋势的诉求。不只如此，我们，以及其他合着作者，都致力于让本书可以在[开放取用平台](#)上供大众阅读。

以西班牙语来撰写本书确实会为传播我们的研究成果带来挑战，这对于所有以英语作为主要工作语言，并且同样用英语来思考和政治、社会问题、冲突与行动者的环境中所产出的出版物而言尤其如此。这样的挑战对于处在全球或区域边陲国家中的学者和社运人士尤其严重。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本书可以被翻译成其他语言，让非西班牙语的读者能够更容易的了解本书内容；同时，我们也希望透过《全球对话》中与其他实体和语言的互动，可以使本书想谈论的对话变得可能。■

来信寄至：

Marta Romero-Delgado <[martaromerodelgado@ucm.es](mailto:martaromerodelgado@ucm.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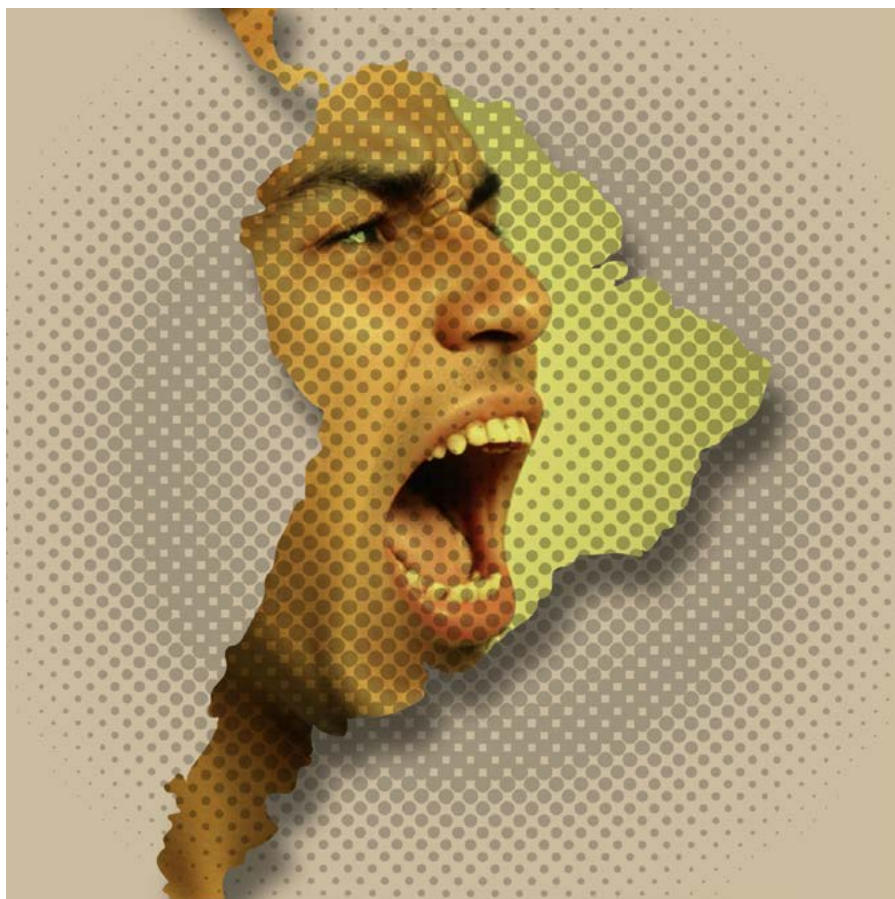
Andy Eric Castillo Patton <[aecastillopatton@ucm.es](mailto:aecastillopatton@ucm.es)>

Gomer Betancor Nuez <[gbetancor@poli.uned.es](mailto:gbetancor@poli.uned.es)>

# > 重建依附理论

André Magnelli，Ateliê de Humanidades、Felipe Maia，茹伊斯德福拉联邦大学。  
Paulo Henrique Martins，伯南布哥联邦大学，巴西。

插图：Arbu，2024。



**在**当前的背景下，承认依附理论的相关性和重要性意味着持续进行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学、思想的历史与流通，以及对边缘和半边缘地区现代化理论的修订的研究。此外，这必须形成对现代性和全球社会过程的通盘理解。但重要的是不要将这些理论的出现条件一概而论，将其视为来自欧洲和北美中心之外的智识产出，就好像它们是全球南方所有社会共同的产物。这样的一般化只会削弱来自半边缘体系的知识分子的贡献，他们试图从经历了重要工业化过程和形成了政治组织的中产和工人阶级的国家社会内部理论化现代化。正是作为拉丁美洲历史中的一种本地化经验，依附理论才能成为扩展对不同地区现代化批判的参考。

## > 具有拉丁美洲根源的视角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拉丁美洲成为质疑现代化理论并创造可产生独立工业化模式替代方案的创新理论特定孕育地。这一过程始于由CEPAL经济学家提出的结构主义—工业主义论题，并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由拉丁美洲社会学家进一步发展，他们将CEPAL辩论延伸到政治领域。当时，知识批评正在扩展，受到对帝国主义和依附反应的驱动，沿着不同的反思路径进行。它涉及与原住民、非裔后代和女性的动员之间的对话，这些动员是在批判殖民性和支持解放的背景下进行的。

依附理论是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之间形成的，代表了拉丁美洲对理解二十世纪社会变

>>

迁过程最具原创性的知识贡献之一。它们关注的核心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不均衡与综合」性质以及现代性的社会和政治形式，以拉丁美洲历史作为经验参考。透过取代当时在社会科学和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理论的观点，并反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所宣扬的论点，依附理论使我们能够理解国家发展主义策略和保守主义一专制现代化计划所呈现的霸权性替代方案的后果和局限性。此外，它们突显了地方政治行为者与全球资本流通系统之间的多重联系。

采用历史性且经常具有比较性的视角，有助于检视拉丁美洲菁英的「文明」或「克服落后」计划与欧美模型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自十九世纪以来在国家和国家建设过程中重复其异质地位。除了研究国际系统中的不平等和依附关系外，还获得了关于殖民性作为这些社会形成的结构性特征的新见解，包括「内部殖民」的因素。拉丁美洲社会既可以从自身条件理解，也可以与其他边缘形成进行比较，而不应被视为不完整的现代化形式。

## > 知识重建

在我们最近编辑的书籍《[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知识重建](#)》中，我们提供了对拉丁美洲依附理论的概述。该书涵盖了它们的智识出现要素、在不同背景中的接受条件、对社会学理论的贡献，以及通过当代主题（如政治批评、环境和气候危机或后殖民问题）更新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旨在将这一重要贡献纳入当代社会理论的历史和范畴，帮助理解全球社会理论发展的多样性及拉丁美洲视角的原创性。该时期的某些产出不可避免地带有当时的印记——属于特定情境的智识、政治和社会问题。然而，依附和不平等的关系有其历史和持久性，并在世界体系或全球资本主义的层面上被提出和重新提出，因此这一知识重建也涉及当前的问题。

## > 从国家独立过程到CEPAL

拉丁美洲在全球现代化另类思维组织中的中心地位并非仅仅是偶然的。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在十九世纪经历了国家独立的过程，而亚洲和非洲国家则直到二十世纪才经历类似的过程。拉丁美洲国家的早期政治解放对于一场重要的美学和智识运动的出现产生了影响，这场运动始于法律和工程学院的建立，也包括文学和艺术运动，并在二十世纪随着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而更加深入。

在二十世纪的头几十年，对于大陆上国家社会形成的反思已有一定历史，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批拉丁美洲经济学家的显著动员开始在欧洲和美国之间活动。他们对于国际自由贸易能帮助制造国与原材料生产国之间实现平等贸易的自由主义论点持怀疑态度。在马歇尔计划的伟大愿景影响下，该计划旨在重建战后的欧洲，他们理解到思考国家规划以促进拉丁美洲现代化的重要性。

这段历史中的一个里程碑是1948年在智利圣地亚哥成立的CEPAL（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这个机构聚集了一群来自不同背景的社会科学家，尤其是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他们在这个知识循环中成为了最重要的参考点，尽管面对美国安全机构的抵制，这一循环仍在扩展。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CEPAL在塑造以国家为主要现代化推动者的发展主义模型中发挥了战略作用。其主要制定者包括智利经济学家Raúl Prebisch和巴西经济学家Celso Furtado。

## > 思想的流通

我们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展示知识分子和思想的流通在二十世纪下半所创造出创新理论视角方面的潜力，这一点在拉丁美洲尤为明显。目前，社会科学日益全球化，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社会并不存在单一的历史轨迹。因此，考察依附理论在边缘或半边缘地区形成和展开的丰富多样的辩论和理论化的领域，有助于理解当代历史中那些通常不易被察觉的方面。在南美形成一个具有公认创造力和自主性的思想、机构和知识分子的循环挑战了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常规形象。这些形象往往描绘出一种简单的分工，认为全球南方收集社会变革的大过程数据，而北方则对其进行理论化，产出成为社会自我认识的概念和理论的库存。

正是在与霸权理论的对抗中，这个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团体在二十世纪中期创造了自主反思的条件。一方面，这使其成为拥有自身丰富和深刻反思的拉丁美洲知识史的一部分。当地菁英努力在该地区建立大学，并反思其去殖民化过程的具体特征，以及他们试图组织国家社会的努力，其代表人物包括 José Martí、José Carlos Mariátegui、Juan Bautista Alberdi、Domingos Sarmiento 和 Joaquim Nabuco 等，都是这段历史的长期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纪中期该地区出现的特定思想循环具有其自身的特殊特征。

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在同一辩论领域中来自不同国家、学科专业和政治立场的融合，对于创造一个原创的关联性生产网路至关重要，这一网路横跨该地区的多个国家。这或许是拉丁美洲首次作为一个相关且原创的全球知识中心，具备将其影响力投射到其他知识脉络中的能力。我们书中的几个章节中突显了这些问题，旨在阐明在拉丁美洲思想史中知识分子的流通是如何发生的。

重建这些路径有助于我们理解依附理论的产生是如何真正具备社会和集体的维度，并体现出全球南方思想流通的精致与复杂性。与此同时，参与的知识分子持续与知识生产的霸权中心保持交流的管道，形成的循环网路比仅仅是地区性更为宽阔。而许多因素促成了这一点，包括作为五个联合国经济委员会之一的CEPAL的成立，将其纳入国际机构体系中，还有来自欧洲和北美的知识分子在该地区的存在、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家前往外国大学的学习与研究之旅，以及他们的作品在其他脉络中的出版与接纳，这些额外的主题也在我们书中的几个章节中也进行了脉络的重新爬梳。■

来信寄至：

André Magnelli <[prof.andremagnelli@gmail.com](mailto:prof.andremagnelli@gmail.com)>

Felipe Maia <[felipe.maia@ufff.br](mailto:felipe.maia@ufff.br)>

Paulo Henrique Martins <[paulohenriquemar@gmail.com](mailto:paulohenriquemar@gmail.com)>

